

全球对话

11.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Nancy Fraser 谈社会学

Armin Thurnher

理论观点

Michael Fine
G. Günter Voss

工作与 劳动

Rafia Kazim, Chris Tilly,
Brigitte Aulenbacher,
Aranka Vanessa Benazha, Helma Lutz
Veronika Prieler, Karin Schwiter
Jennifer Steiner, Ruth Castel-Branco
Sarah Cook, Hannah Dawson,
Edward Webster, Sandiswa Mapukata,
Shafee Verachia, Kelle Howson,
Patrick Feuerstein, Funda Ustek-Spilda,
Alessio Bertolini, Hannah Johnston,
Mark Graham

人类世： 批判际遇

Ariel Salleh
Shoko Yoneyama
Gaia Giuliani
Ulrich Brand
Markus Wissen
Jason W. Moore

马格里布 的社会学

Mounir Saidani
Mohammad Eltobuli
Hassan Remaoun

议题开讲

- > 从对疫情的回应看不平等问题
- > 以Kuhn的哲学理解Ibn Khaldun的典范
- > 社会想像与巴西的法律社会学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1卷 / 第3期 / 2021.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气候变迁与生态浩劫、不稳定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贫穷、经济与社会的全球不平等，这些现象皆是眼下较为迫切的问题。透过社会学的论辩，我们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进行深入讨论，并省思进步、增长概念和经济体系如何危及生态与社会的再生产。本期《全球对话》将聚焦于人们对人类—自然关系以及经济运作的主流概念，在工作、劳动与世界各地的不同生活方式中引发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文章回归经典的讨论，另一些则试图分析其对未来的影响，还有一些对现代发展的重大议题进行反思。

首先是一场采访，由奥地利著名记者 Armin Thurnher 与知名美裔哲学家、批判理论学者 Nancy Fraser 对谈。其中，她回顾身为左翼的经历，介绍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并向我们阐明如今的经济型态正侵蚀、破坏着社会与生态基础，而疫情也必须被视为此种经济带来的后果。

在理论观点中，Michael Fine 分析照护问题以及相关劳动的市场化、讨论不同的治理模式如何促成照护劳动供应不足与其恶劣的工作环境；疫情与照护机构的死亡事件，也让我们得以看见市场取向的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G. Günter Voss 则借由哲学、政治和社会科学过去与现在的经典，深入讨论工作和劳动议题；他也在文章中揭示有偿、无偿工作与劳动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以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意义。

本期刊物的第一个专题里，作者们结合理论思考和经验发现，思考工作和劳动议题；文章带领大家关注世界各地，理解不同形式的工作和劳动面貌，并分析其工作条件。Rafia Kazim 在文章中呈现疫情如何影响印度的移民劳动者，Chris Tilly 则反思不稳定和非正式劳动的全球现象。此外，奥地利、德国

和瑞士的一项比较研究，描述了不同的住家照护模式；南非和英国的学者则关注数位劳动议题，讨论了演算法全球南方的平台劳动、线上零工经济以及「云端工人」安全等问题。

第二部分的专题中，文章围绕「人类世」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一部分作者提出其对于人类世的新的看法，另一些作者则对此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所有文章都对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等级关系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其中涵盖了目前社会学领域中的各种议题。Ariel Salleh 批判现代社会中佔据支配地位的自然概念、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并透过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运动的概念与之对抗。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 Shoko Yoneyama 和 Gaia Giuliani 则认为「人类世」的概念有其局限性，并指出重新定义人类—自然关系作为理论取向的潜力。Ulrich Brand 和 Markus Wissen 研究「帝国化的生活模式」与对劳动、自然的剥削如何成为霸权。Jason W. Moore 也从类似的角度出发，批判「人类世」的意识形态性质，并提倡以「资本世」的概念进行地理史的分析。

在接下来的专题，作者们对于社会学的发展提出洞见。Mounir Saidani 向马格里布地区的社会学家征稿；汇集了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和利比亚的观点，对在地科学界、研究与教学、专业与（非）公共社会学进行思考。

最后，「议题开讲」部分则分析疫情下的尚比亚草根行动、Ibn Khaldun 的新科学典范，以及巴西法律社会学背景下的想像概念。■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主编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至 [GD 網站](http://GD網站)。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编: 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i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尔及利亚)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Sebak Kumar Saha, Sabina Sharmin, Abdur Rashid, M. Omar Faruque,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Shahidul Islam, A.B.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u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Syka Parvin, Yasmin Sultana, Ruma Parvin, Ekramul Kabir Rana, Sharmin Akter Shapla, Md. Shahin Aktar.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Rakesh Rana, Sandeep Meel.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ulian Gabor, Monica Georgescu, Ioana Ianuş, Bianca Mihăilă, Maria Stoicescu.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洪崇仁, 郭智豪, 黃翊頤, 黃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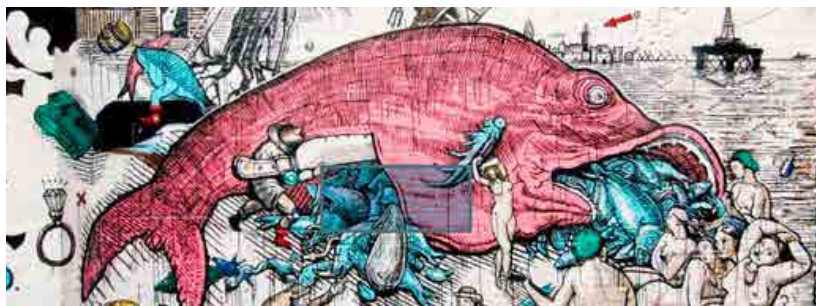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Nancy Fraser 在接受 Armin Thurnher 采访时, 反思自身在左翼运动中的经历, 分享了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并解释经济如何带来这次的疫情, 它侵蚀和破坏了生活的社会和生态基础。



在此专题中, 作者们结合理论思想和实证结果, 对全球不同形式的工作和劳动进行分析。



借由和过往理论家对话, 并从迥异的角度对其理论进行批判性验证, 这些文章针对人类世的概念进行了一场辩论。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

> 社会学对话

疫情——资本主义不合理性之下的一系列灾难	
Armin Thurnher, 奥地利	5

> 理论观点

疫情下照护中心的死亡问题	
Michael Fine, 澳洲	9
通往当代的工作理论化	
G. Günter Voss, 德国	12

> 工作与劳动

COVID-19 及印度的移工	
Rafia Kazim, 印度	16
全球脉络下的非正式及不稳定的工作	
Chris Tilly, 美国	18
奥地利、德国、瑞士照护工作上的争议	
Brigitte Aulenbacher、Veronika Prieler, 奥地利; Aranka Vanessa Benazha、Helma Lutz, 德國; Karin Schwiter、Jennifer Steiner, 瑞士	20
数位时代下工作的未来	
Ruth Castel-Branco、Sarah Cook、Hannah Dawson、Edward Webster, 南非	22
破解演算法控制	
Sandiswa Mapukata、Shafee Verachia、Edward Webster, 南非	24
线上劳动平台:无法被制衡的权力?	
Kelle Howson、Funda Ustek-Spilda、Alessio Bertolini、Mark Graham, 英国; Patrick Feuerstein, 德国; Hannah Johnston, 美国	26

> 人类世:批判际遇

Holding 作为劳动与认识论	
Ariel Salleh, 南非	28
宫崎骏动画:人类世的万物有灵论	
Shoko Yoneyama, 澳洲	30
人类世及其争议	
Gaia Giuliani, 葡萄牙	32
帝国生活形式与资本主义霸权	
Ulrich Brand 和 Markus Wissen, 德国	34
抛弃人类世:资本世中的人类与自然	
Jason W. Moore, 美国	36

> 马格里布的社会学

马格里布社会学:历史与展望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亚	38
利比亚的社会学	
Mohammad Eltobuli, 利比亚	39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教学、运作与地位	
Hassan Remaoun, 阿尔及利亚	41
突尼西亚社会学:面临三重危机	
Mounir Saidani, 突尼西亚	43

> 议题开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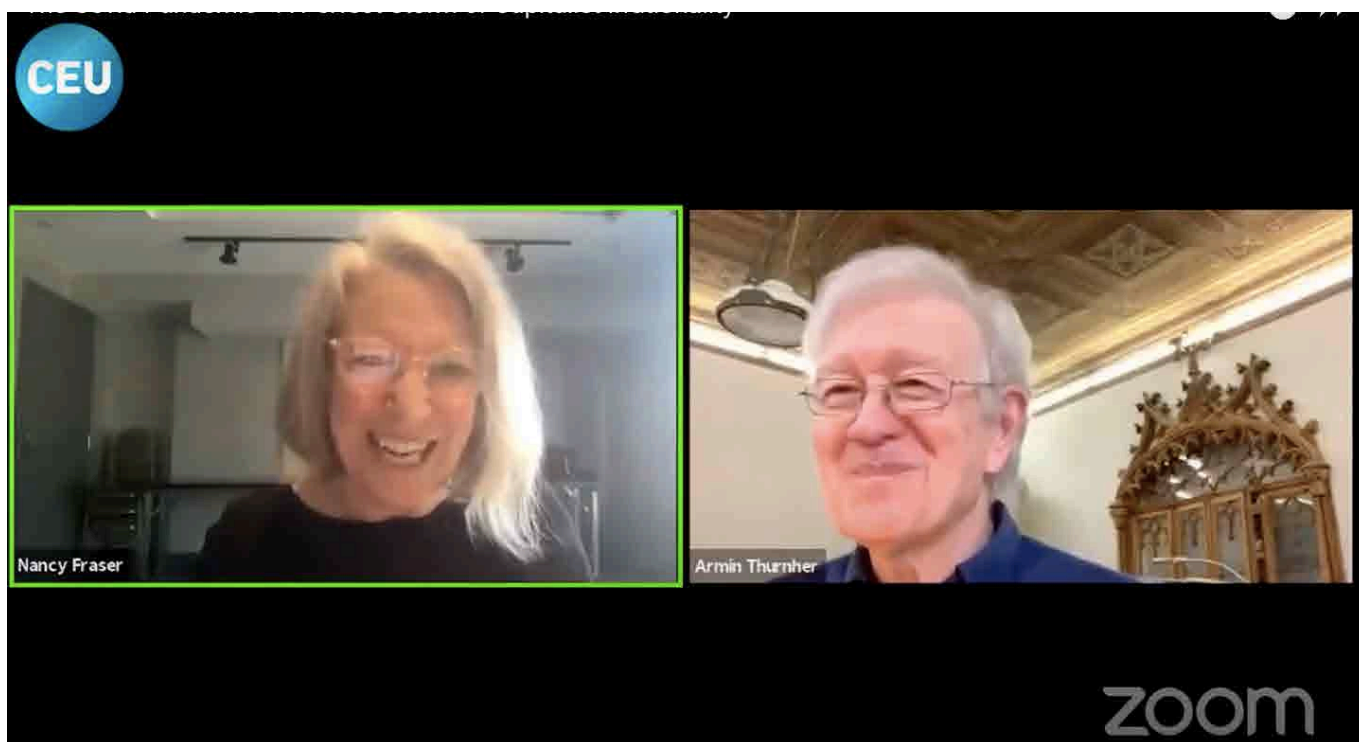
从对疫情的回应看不平等问题	
Wilma S. Nchito, 尚比亚	45
以Kuhn的哲学理解Ibn Khaldun的典范	
Mahmoud Dhaouadi, 突尼西亚	47
社会想像与巴西的法律社会学	
Francisco Bedê、Gabriel S. Cerqueira, 巴西	49

『唯有在照护、自我照护、地球照护的三位一体之下,人类对人类、非人生命、非生命体的责任才得以实现政治价值。』

Gaia Giuliani

> 疫情：资本主义不合理性之下的一系列灾难

Nancy Fraser 专访



在2021年担任波兰尼访问教授的时候，Nancy Fraser 在 Zoom 上接受 Armin Thurnher 采访。

2021年五月，知名哲学家、批判理论家 **Nancy Fraser** 和来自新社会研究学院(NSSR)的 Henry A.、Louise Loeb 两位政治与社会科学教授，以及奥地利著名周刊《Falter》创办人／出版人 **Armin Thurnher**，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访谈。Nancy Fraser——首位受邀于维也纳市、中欧大学、维也纳大学、维也纳经济商业大学、维也纳劳动商会，以及国际卡尔波兰尼学会担任客座教授的学者，与身为政治记者的 Armin Thurnher，将在本期刊物收录的这篇访谈中，讨论当代的重要议题；并介绍 Nancy Fraser 有关左派的经验，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和疫情的分析。

AT: Nancy Fraser, 你是如何从政治哲学家转为一位社会主义者的？我们知道你是68世代的一员，不过那一代人很少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NF: 我在马利兰州的巴尔的摩长大，当时那边还是「吉姆克劳城市」(Jim Crow city)，一个仍

然受到种族隔离法管制的城市。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这个系统对我来说虽然有一些不对劲，不过大致看上去似乎很正常。然而民权运动、种族隔离运动爆发，促使我重新诠释了我的童年和家庭状况。我的父母是罗斯福自由主义者，但我渐渐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所宣扬的概念。我于是将青少年叛逆的愤怒，转移到政治领域；

>>

先是民权运动，然后是反越战运动，接着是跟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标准流程——参与在 SDS、女性主义等议题中。

关于我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我当时很积极地参与了针对越战的反征兵运动。我们鼓励年轻的美国男性烧掉他们的征兵卡，拒绝从军。在这种强烈的激进气氛里面，我甚至开始着迷于越南僧侣为了抗议战争而自焚的事件。我只是想告诉你那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时代：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我边走在路上，边对自己说：如果你真的反对战争，那你怎么能不把自己烧死呢？幸运的是，我碰巧遇到了一些托洛斯基主义者，他们对我说，「看，还有另一种方式」（笑）。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加入了 SDS 的社会主义。

我一开始以为美国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我终于发现这只是一种幻想。不过，新左派的价值观和精神对我来说仍旧非常重要。我的基本道德直觉、政治实践并没有真的改变。我希望现在的自己已经比那时候更老练，且更能了解发展这些直觉和观点意味着什么。但 68 年对我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AT：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老师，还有最重大的学术影响是什么？

NF：我一开始是就读布林莫尔学院，那是一间菁英女子大学；我在那边学习古典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我的老师是 Richmond Latimore，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伊利亚特》（The Iliad）的翻译家——我到那里读书就是想要接受他的教学。不久之后，我的兴趣转向哲学，同时也持续使用过去累积的语言知识。随着 60 年代的发展，我逐渐感到自己接受的古典教育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我心中激进的那部分逐渐占据上风。在对政治与知识的热情之间，我有过很大的挣扎。Richard J. Bernstein 是我在新学院的同事，也是一位重要的导师，曾帮助我找到兼顾两者的方法，更将法兰克福学派介绍给我。我在这个学科中读到的第一本书是 Herbert Marcuse 的《单向度的人》，这本书打中了我，其描绘出了在社会中生活的感觉——当身处社会中，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更常是一种疑惑、模糊的状态，而不是清晰、明确的。

AT：卡尔·波兰尼是怎么出现在你的人生中的？你觉得他是个有趣的历史学家吗？虽然海耶克的理论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海耶克的存在。你认为波兰尼为何没有落得海耶克不为人知的下场？

NF：我第一次知道波兰尼，是在布林莫尔的政治科学课堂上读到《巨变》。当时他并没有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那时候正热衷于马克思，在当时的我心中，波兰尼与之相比可能就没那么吸引人。多年以后，当我再次阅读波兰尼的作品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了不起的思想家，而那本书又是多珍贵的宝藏。所以我开始在课堂中以他进行教学。在重新阅读和以其作品教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开始认为我的世界观是围绕着「两个卡尔」：马克思和波兰尼，两者皆有丰富的见解，但也各自具有盲点。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是要将两位卡尔的观点，整合成一个单一且更全面的理论框架，并将盲点消除。这样说并不精确——我关注的不限于两个卡尔，而是「两个卡尔+」，「+」指的是女性主义理论、生态理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马克思和波兰尼都没有足够的讨论。

AT：我们来谈谈疫情吧。当想到疫情，我们通常会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预测的灾难，与人类的行为无关。在阅读你即将出版的书之后，我的看法有些改变。请详细说明。

NF：《食人资本主义》一书中，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写的，但我将这本书的后记命名为《资本主义不合理性与不正义下的一系列灾难》——这就是我对疫情的看法，其是资本主义所有不合理性和不正义的汇聚。一开始，我和你有一样的看法，认为疫情是一场自然灾害。后来，我认识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是流行病学家所说「从其他物种向人类传播的人畜共患疾病」。COVID-19 的病毒来自蝙蝠，它们生活在远离人类的偏远洞穴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从未带给任何人类任何麻烦。然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才让这些蝙蝠和一个过渡／中间物种接触，最后这个物种则和人类有了接触，我们就是这样接触到病毒的。所以问题在于：这些过去彼此疏远的物种，如今为何产生了接近性？这关乎两件事情：全球暖化和热带森林砍伐。两者都引发大规模物种迁移，濒危、不适生存的物种试图寻找新的栖息地。许多痛苦的生物找到了新的栖

息地，并接触到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其他物种。很快，新的人畜共患病毒便传播开来。我想顺便补充一件事：这样的过程和之前SARS、中东呼吸症候群、伊波拉和爱滋等病毒的爆发是相同的。SARS是由蝙蝠传给果子狸、再传给人类的。中东呼吸症候群则是从蝙蝠到骆驼、再到人类。虽然科学尚未有定论，但COVID-19很可能是透过穿山甲或其他中介物种传播给人类的。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下，事件触发的源头都是全球暖化和热带森林砍伐。那么，这两者的背后是什么呢？资本主义。正是这个系统用温室气体冲击了大气，导致全球暖化。这个系统砍伐雨林，为采矿和畜牧业铺路。COVID-19的疫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绝不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后一次疫情，因为那些潜在的因素仍然继续着。所以，是的——疫情是自然的灾害，但其成因不仅是自然的，是资本主义破坏了稳定的自然现象。

AT：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就开发出了疫苗，其在危机中也变得非常有创造力。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另外一面吗？

NT：是，也不是。我们在医疗卫生问题的理解上，太过于重视个体治疗层面了。医疗卫生也有公共建设不足的问题，这场疫情使得这点更加明显。这告诉我们，维护卫生的公共建设是多么重要——如同我们必须维护道路、桥梁和其他有形的公共建设一样。在世界上出现突发卫生事件时，掌握着大部分应对能力与资源的人是私营企业：其掌握了劳动力、原料、机械与生产设施、供应链和智慧财产权；但他们对公共利益却不感兴趣、关心的是利润和股价的底线。我们在目前关于疫苗智慧财产权的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这关乎到疫苗是否会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给全世界使用；如果我们想要控制病毒，就应该且必须达成此目标。公共卫生能力的私有化，即是此目标的巨大障碍。

现在，我们来讨论你对于资本主义的辩护。首先，是疫苗得以快速开发，大部分的是来自公共部门的努力，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我只知道美国的情况，但其他国家也有许多公共贡献——这当然包含古巴、中国和俄罗斯，也许还包含其他国家。无论如何，许多准备工作使我们口中的莫德纳疫苗，有机会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努力下完成研发。如同网际网路，美国国防部也是先驱；网际网路最初是公共产品，后来才被

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等公司收购。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最初都是由公共部门开发的。因此，资本主义有没有明确值得讚赏的部分，我并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正面回答。我会说，应该得到讚扬的是科学，而科学可以——也已经有过许多在公共机关支持下发展的案例。

AT：但是美国有个问题：它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没有人喜欢这个政府。显然，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以及像澳大利亚和纽西兰这些可以自我隔离，并采取更强硬措施的民主国家）在对抗疫情上取得了成功。在欧洲，人们则倾向过分强调公民自由受到威胁，而忽视了公共卫生的措施。

NF：美国的这种问题更加严重。1月6日有一群人入侵国会大厦，尝试要阻止或推迟拜登的总统选举获胜；在川普的鼓动下，这些人有一个「深层政府」(the deep state)理论。他们相信一些非常奇怪且危险的阴谋论，包括不承认新冠病毒、气候变化的真实性，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政府对人民控制的骗局。这些想法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政治文化——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中。在右派川普支持者民粹主义的生态系统中，这种对政府的怀疑如今已经变得极度狂热。作为一名左派，我对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抱持着许多反对，例如入侵伊拉克和其他可怕的事情。我更愿意依赖国际机构，假设它们有能力、独立于大国之外。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并不强大，可能没有以最好的方式达成他们的责任。但无论如何，当面临紧急的卫生事件时，我们必须依靠现有的公共权力。而做得最好的国家——我想包括中国——是那些民众对于公共权力相对积极的国家。他们也许需要更民主的公共权力，不过他们不是疯狂的自由意志／个人主义者。相较于对市场的支持，美国政府一直难以行使权力。美国迅速地让大约1亿人接种了疫苗，但由于人民对疫苗的犹豫和抵抗，接种陷入停滞。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引入疫苗护照是更好的做法。不管要去看篮球赛、剧院，你都需要证明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或者是出示其他有效的医疗例外证明。这可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在某些情况下，你需要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如果禁止在餐馆吸烟，或是对不系安全带的司机罚款是可以的，那么将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排除在室内公共集会之外也是可以的。

AT:在这种不受控、反国家和反公共沟通的环境下,新的社交媒体作为一股全球力量,你认为不满与不同意——而非同意——如何被制造出来?

NF:我不会说我们制造不满。我会说,是资本主义制造了不满。我们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多维度的全球危机之中,这是一场危及整个社会秩序的普遍危机。新冠肺炎只是其中一方面,还有许多其他面向: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制度和政治领导者辜负了人民。不满无处不在——这是理所当然的。右派、独裁且排外的民粹主义,即是这种不满的表达,虽然他们对于事态的源由与解决方式,有着极度错误的理解。不满的形式也有比较好的,像是左派民粹主义和 Bernie Sanders 运动,它们代表了更具理性、更有希望、更多解放的形式。不满是存在的。但你是对的,这些不满和各种过程交织在一起。例如,例如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和网红,看似背离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却仍然在社群媒体的演算法环境下,强化了群体思维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情况是很复杂的。

说了这么多,我除了一些理论之外,也没有制造其他的事物。我希望自己创造的理论能够帮助那些,因为各自的原因、在各自的处境中面对困境的人可以得到问题的解答;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口,困境有着不同的样貌。许多人确实进行着抗争、运动,且对于现实并不满足。他们想要改变,并正尝试从对于「改变什么」、「如何实现改变」的不同理解中实践。我试图介入此过程,并指出很多导致不满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件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的形成基础,本质上就是要吞食自然、将财富和种族化的劳动人口集中、不重视照护工作的价值、牺牲维系家庭和社群的能量,甚至掏空能够解决问题的公共权力。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干的好事,也是写在其基因之中的本质,并不是偶然。所以,我想说的是:将社会系统作为地图,去看清楚你的不满和他人的不满之间有什么连结——我们要认知到,不满只有一个源头,一个共同的敌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战斗吧。■

來信寄至:

Nancy Fraser <frasern@earthlink.net>

> 疫情下照护中心的死亡问题

Michael Fine, Macquarie University, 澳洲, ISA成员、前ISA老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11)副执行长



2021年4月，一家人来到疗养院探望祖母，这家疗养院因疫情的限制措施而被分隔于玻璃两侧。来源：公用网域。

疫情的社会回响，从家庭和虚拟环境中人际互动的微观层面，到照护实作与照护关系所影响到的，整体国家人口及其跨国互动的宏观层面。这些行动都需要被理解为照护的形式。

近年来，去发展承认照护重要性的理论，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来自2020到2021年的疫情证据显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回应令人痛心。虽然少数国家的公共卫生措施表明，限制疫情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但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在挣扎着。

在疫情的压力下，国家承担了整体的照护责任，承担了支撑和保护人口的任务，并在管理他们的福祉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由于市场无法应对，并有完全崩溃的风险，政治领袖的反应，当时是凑合的，在管理往后的事件时也仅有部分是成功的，且这样的成功是由国家机器的宪法权力、制度和惯例来构建的。

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里，从封建主义与传统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时代，产生了现代世界，在波兰尼所说的“市场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一套提供照护的社会体制。在最晚近的阶段，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的重组看到大多数先进经济体的国家利用其权力，通过促进服务业市场来改变整个照护体系。这些市场和各种形式的准市场的运作，从儿童照护和教育，到整个生命进程中的身心障碍支持和医疗照护，再到老年照护和住房，已经逐渐地支撑并塑造着我们的现代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特别是西欧和北美，明显地没有作出相对有效的反应。这些富裕的已开发国家通常在全球享有高生活水准的富裕人口名单中名列前茅，这些国家拥有所谓的有效管理系统和表现良好的卫生和福利体系，却显得特别脆弱。

>>

2020年,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先是被病毒的传播,而后又被医疗服务的问题所困,无法有效控制疫情。2021年,疫苗供应和复盖率的问题,伴随着一系列极端保守的阴谋论动员和对养生和自然疗法的天真信徒,其对疫苗的普遍敌视和怀疑,似乎呼应并复制了,大多数富裕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最初的错误决策。

这场疫情所暴露的社会规范和治理问题以五花八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没有什么比整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中,数十万名在照护中心内的,可以被避免的死亡人口还要更令人感慨和悲恸。从这个意义上说,照护中心是一个案例研究,是一个微观世界,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我们有可能识别和划分出这一流行病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照护提供和规范的更广泛系统中所暴露的许多问题。

在照护理论的基础上,这里提出了两个来自波兰尼对市场社会产物的分析,目的是促进对照护的政治经济层面理解,并为应对疫情的国际研究提供参考。首先指出了照护市场化带来的治理问题;接着涉及公共照护商品化的后果,特别是表现在照护人员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日益不稳定的劳动依赖上。

> 照护中心内的死亡

在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期间,死亡率数据往往是不可靠且被低估的。一些国家在最初的全国染疫总数中遗漏了护理中心的死亡人数。国际长照政策网在2021年2月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在疫情的第一年22个有可靠资料的国家中,平均有41%的COVID-19死亡者是照护中心居民。这从澳洲所有Covid死亡人数的75%,到韩国报告的仅8%不等。在可获取资讯的大多数国家,这些数字都高得不成比例。在加拿大,59%的Covid死亡病例发生在照护中心、荷兰为51%、瑞典为47%、奥地利为44%。在美国,有139,699人死于老年照护中心,占疫情第一年全国死亡总数的39%。

照护中心由国家资助和营运,以照顾和保护需要支持的老年人。它们应该成为避免传染的避风港,为其居民提供保护。相反,它们成了最脆弱的年龄组中的感染传播中心,证明了公共政策在提供保护方面的普遍失败。与家庭看护比较,照

护中心在预防传染上的失败不能归咎于其居民的年龄或慢性病,也不能归咎于个别工作人员的失误。尽管在每一次染疫事件中都有一系列特定的、地方的因素影响,但这种死亡的全球现象强调了一种更有理论基础的社会学方法之重要性,这种方法使公共照护体系的失败,背后隐含的共同因素变得清晰可见。

在包括澳大利亚的许多国家,进步的声音认为,这些死亡是政策的结果。允许养老院通过私人企业运作,将利润置于人之上。尽管在一些国家有很多间接证据支持这一论点,但国际间的比较结果显示,追求利润和死亡之间的确切联系既没有因果关系,也不是普遍现象。一些营利性养老院有很多人死亡,但多数的却没有记录。与此同时,一些非营利性养老院也报告了大量的Covid死亡案例。在其他国家例如荷兰和瑞典,有大量的死亡报告,不能与业主对利润的追求联系起来。

> 市场化和治理

然而,市场的联系不应该被忽视。国家对养老院的支持是为了应对市场的历史性挫败而发展的。但在过去的20-30年里,照护市场在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被重新引入,有效地确保了所有受影响的养老院的运作被置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无论其法律所有权为谁所有。这个过程(市场化)与波兰尼记录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引入自由放任市场体系的过程相呼应,也很相似。在每个时代,市场体系都是由政府有意创造的。

今天,市场化出现在照护和人性服务领域,既是横跨整个系统的合法化逻辑,也是塑造其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内部互动的执行模式。它的作用是通过打破阶级制度和官僚权力的关系,纵向地裂解整个系统,横向地破坏与颠覆地方和区域层级的合作以及内部的服务和设施。尽管波兰尼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对“治理”问题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假设,有助于解释Covid死亡案例和市场化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治理的概念是与市场化同时出现的,并且在实践中与“新公共管理”等意识形态有所关连。

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权力被越来越多地下放给企业层级的管理,在那里,保密和独立优先于合作和系统整合。在照护中心,市场对消费者

选择的重视伴随着对更传统的医疗卫生责任的转移，在许多情况下影响了专业人员的要求。照护中心因此越来越不适合管理防疫。尽管如此，照护中心被要求作为独立的单位来运作，因为它们被公共卫生措施有意地与更广泛的急性健保服务系统，特别是医院隔绝。可以假设，它们的自主管理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 不稳定看护工作的结果

与市场化密切相关的，还有照护中心对不稳定的低薪劳动力依赖逐渐增加。市场的压力已被广泛用于降低工资成本，以控制财政支出，同时继续确照护产业的投资盈利。这导致了成本的降低，在Covid爆发之前，成本降低代价主要是由看护人员和照护中心其他重要的家庭看护承受。

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和卫生当局的报告都指出了这些工人毫无保障的就业环境，与照护中心内部和不同照护中心之间的传染有所关联。被迫在多个不同的照护中心工作或从事不同的工作以赚取生活费的不稳定工人，显然塑造了疫情对照护设施的破口。因此，不稳定的看护工作增加反映了市场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现在为维持照护服务所采取的措施反而对其安全造成了威胁，并破坏了其长期的生存能力。因此，正如Brigitte Aulenbacher和她的同事最近所论证的那样，将照护服务作为一种商品来进行市场交易，似乎看到照护实际上已经成为波兰尼所说的「一种虚构商品」。

> 结论

从护理院提供的护理的角度来看，这场疫情的影响是具有广泛破坏性的。但它们是反常的，也暴露了市场化的局限性，并创造了国家回到社会和政治规范核心的必要和流通条件。这是否也是更深层次变革的预兆，即波兰尼式的双重运动概念所确定的那种可能的历史转向？

全球性的疫情危机及其在各国的表现点出了一个民主社会学习的机会，即重新将照护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福祉看待，而不是看到它继续被当作一种已经成熟的经济商品甚至更进一步的剥削。然而，是否可以期待一个进步的和受欢迎的社会运动出现，以回应病毒所揭露的失败？如果是这样，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以确保其成功？它可能采取什么形式？正如在大流行病的头两年里，由阴谋论激发的、以日益激进和无法容忍的国家政治民粹主义形式为基础的反疫苗运动，其崛起所表明的那样，这肯定是疫情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提出的关键问题。■

來信寄至：

Michael Fine <michael.fine@mq.edu.au>

> 通往当代的工作理论化

G. Günter Voss, 荣誉教授, Chemnit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德国



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将工作视为经济活动的狭隘观点根深蒂固,其他形式的工作(如家务或家庭相关工作)进一步被边缘化,几乎成为「隐形的工作」。

来源:(左图)创用CC,(右图)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分部。保留部分权利。

在 社会学术语中,工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使用身体力量及精神-身体技巧的有目的之人类活动。就其它标准(如成就、效用、工具、薪资等等)往往作为主要方面而加以引用的事实来说,此一范畴还远未被明确定义。即便工作是由个体所从事,它至少是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被整合进且型塑于持续变化着的社会脉络中,而后者是以劳动的分工(合作社、组织等等)为基础的。

> 什么是工作

不像其它概念一样,工作的概念在科学的以及特别是在社会实践的方面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最近,出现了关于工作究竟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的激烈争论。以下是关于如何更清楚地对工作进行定义的一些反思。

一个长久的问题在于工作是否全然的「负担」,或者它也能提供「愉悦」(pleasure)——基于其所能带来的成就感——并为积极的自我发展提供重要机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隐藏在这一区分中。其中之一视工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构成了经验不可或缺的机会,缺少此一机会将意味着对本质性的人类需求甚至人类尊严的真实否定(veritable denial)。然而,工作的具体历史表现已经(并将持续地)与社会中的许多群体的负担和危险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徒劳无功的各种新形势。此一区分也体现在拉丁语单词 labor (阵痛或艰难)和 opus (创造以及被造物)之间的差异中,后者也反映在英文单词 labor (其中包括有分娩的意思)和 work 之间切且更进一步地体现在德文单词 Arbeit 和甚少使用的 Werk 之间的差异中。

当然，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在两个方面（「工作／劳动的双重个性」）之间所做的区分（当然也是亚当·斯密甚至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区分，后者使用了「oikonomia」和「chrematistics」这样的术语）：一边是透过「具体」的生产性劳动创造实际的「使用价值」，另一边则是透过「抽象的」劳动生产经济上的「交换价值」。据其论证，上述对照在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系统性的促进，从而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

虽然发达社会中对劳动者的活动主要是为了赚钱（「能获利的工作」）的假设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如今更广泛的工作概念却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工作的概念在历史上呈现出了多样的形式，不仅在实质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社会感知上也有所不同。这也表示了工作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过去常常且如今仍是从属于持续的变迁的。在收入导向的形式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基于工资的劳动，而对少数人来说则是，大量的形式的自我雇佣），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多样的工作表现：「志愿工作」或「公民参与」（尤其不以赚钱为目的）；「基于任务的」或「政治工作」；「家务活」（采购、煮食、清洁等等）；「家庭相关和照顾的工作」（育儿、看护、老人照顾等等）；「自给自足的工作」和「生计工作」（包括提供自给自足的那种直接生产）；「强迫性劳动」（由罪犯、应征入伍者、奴隶所从事）。

同样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被相当直接地视为主要是物质的「生产性」活动，虽然各种事实证明了这是对现实的不准确的描述。人们逐渐地承认即便是「非生产性」的工作也非常重要（比如行政工作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并且那种长久缺乏认识的「服务」（比如直接或间接的个人的、资讯的、金融的和技术的的服务）也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

并且，同样显着的是，人们不太情愿地承认明显具有毁灭性的工作不仅只有几种变体（战争相关的工作、暴力犯罪活动、伤害性改造以及／或者对自然世界的彻底破坏）。由此可知工作总是表明了其持续改变的形式，亦即在现有形式（比如一棵树）的毁灭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比如一张椅子）。

此外，对于工作的被广泛诉诸的「效用」之评估也根据其各自的优势而有着很大的差异：乍一

看来有利的事物在其它的情况中可能转变为实质性的不利；短期内可能有用的事物长远来看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害。

当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还有如下问题，即究竟工作是一种固有的人类特征因而属于作为马克思所称为「类存在」（species-being; Gattungswesen）的人类进化上的独一无二的核心特征，抑或者其它活物也同样能够从事（perform）工作？近期的民族学研究发现表明类似工作的活动、对基本工具（rudimentary tools）的偶然独立的使用、甚至是确定形式的生产等都不专属于胎盘动物，更别说专属于人类了。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动物能够从事工作且使用工具。他因而主张人类劳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工具的生产，但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操作，而正是后者——以马克思自己使用过的表达来说——从「最好的蜜蜂」中区分出了「最烂的建筑师」。今天，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有时令人相当不安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复杂的机械和流程（比如灵活的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也同样能够从事工作？

> 随时间而变化的工作概念

上述的概念上的张力显示了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如此高度分歧的工作观念表示了一个固有的社会学关怀。为了说明这点，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

-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当透过体力活动为每一天的实际生活制造（如今被理解为「劳动」）物品归属于不自由的奴隶和女人的主要任务时，留给完整的（男性）公民的则是政治的或哲学上的智性工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兵役。而工匠的技艺（techne）则表现为中间形式。

- 在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封建制度中，一般的工作概念指的是主要由不自由的个体所从事的大多属于农务的体力活动。除此之外还同时存在着被精英（贵族、圣职者）所追捧的「自由」活动。在此蕴含了那种将体力任务视为对伊甸园中人的失落（Fall of Man in Paradise）的神圣惩罚之持续否定性的解释（construal）。与此上述惩罚相对，被高度重视的是实际的宗教实践（敬拜服务）。此种对于工作的理解逐渐导致关于实际的体力活动的肯定性看法，

>>

即后来被视为一种神性的反映(reflective of divinity)或甚至是神的意志。在修道院中,出现了一种工作文化,在该文化中,生产性工作虽然仍不等同于宗教服务,但得到了明确的讚赏(ora et labora)。

· 在城镇建立的背景下,不断扩大的手工艺文化、跨区贸易和技术进步的结合不仅促进了对生产性工作的高度评价,却也同时促进了一种为善而去—禁止(de-tabooed)的赚钱导向。路德及其改革为能获利的工作指定了一种近乎神圣法令(divine ordinance)的状态(即所谓 a “calling” 或者 Berufung)。韦伯在其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中强调了这点,透过作为西方(「西洋的」)资本主义的关键基础的对职业成就的渴望(aspiration)确定了「不懈的努力」(restless effort),从而查究加尔文主义预选说(predestination)中固有的神圣选择性(divine chosenness)的迹象。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同时地强调了工作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基础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作为一项自然人权的话。

· 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伴随着其它形式的工作,(比如家务活或家庭相关的工作)在文化上的进一步边缘化甚至近乎成为「见不到的工作」,一种将工作视为经济活动的更狭隘的工作观佔据了主导地位。被人们正式地认可的工作形式被认为是基于越来越专注于获得相关技能的专业化活动。大多数的人(包括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儿童)不可避免地依赖于通过专业化市场(「劳动力市场」)上有偿出售其劳动力来获得现在所需的货币谋生手段。其中被拒绝或失去了就业机会的个体将会被视为「失业者」,亦即「没有工作」的人(尽管在某个意义上他们并非没有工作)。

工作的实际历史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上的工作概念同时展开,但两者并不相同。在各种情况下的主导观点往往捕捉到的仅仅是相关工作活动的快照。相比之下,许多对社会重要的任务被系统性地忽视进而遭到贬值。除此之外,工作的实际历史往往是「工具」的历史因而是人类作为「自然存有」(natural beings)与其自然生存条件和其「内在本性」(inner nature)相互作用的历史(马克斯)。在此意义下,工作的历史一方面是人类能力和技能、技术可能性以及对本

性的潜力之利用的惊人发展的历史。同一时间,它也是对自然的和文化的价值的毁灭、对人类的剥削和异化以及不断重复的徒劳无功形式的历史。这直至今天仍然有效,且不断地加剧进而导致与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不仅包括了那些——在在地和全球的范围内——从工作中因此从能够使他们自我持存的就业机会中被系统性地排除的人们的历史。自从工业化初期出现的异样的大规模贫困透过在某些地区建立(有限的)社会保障系统而得到缓解,伴随着社会保障系统和就业关系的撤销管制的危害再一次普遍地增加。偶尔对许多人来说惊讶的是,经常有证据表明即便在全球北方(的福利国家,与工作相关的疾病不仅表现在身体上,且还表现在眼中的心理状况。

> 工作的社会学式理论化

社会学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工作的主题(尽管往往只是选择性地)。过程中,社会学家借鉴了不同学科的概念。但社会学理论的形成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之交才变得更加的广泛。以下将以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点:

· 黑格尔伴随其观念论主体哲学,是最具影响力的早期现代工作理论家。他认为工作构成了一种在智性的引导下的「外化」(同时也是自我的「异化」),以作为人类在他们的产物中看到自己并透过对这些产物的主体性「佔有」(subjective “appropriation”)而获得其「自我意识」。

· 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却认为工作并非「纯粹智性的」,而同时是「感性的人类活动」和住一套的经济生产活动。他发展其最初对工作的一般肯定性的观点进而将其扩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指的是资本主义通常的工作形式即作为异化的「雇佣劳动」——下的劳动的全面分析及批判。根据马克思,人们只有将他们的「劳动力」,比如他们的工作能力,作为商品出售方能生存。在工作场所的背景下整合到被控制的和受监控的流程的工作构成了为产生「剩馀价值」和经济「利润」的经济剥削的基础。由此,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种自我决定的人类工作经验的可能性将系统性地遭到扭曲及终极的破坏。

· 涂尔干在其一篇早期著作中发展了一种社会分化的模型。对他来说,所谓「劳动分工」意味着

>>

一种范畴化，后者将社会能力分类为特殊化的专业功能。他根据历史的角度看到了从不发达的「机械的」分工而成的相似的社会单位（「劳动的部分分工」，伴随着透过集体价值所确保的「团结」）到差异化的「有机」分工而成的逐渐相异的单位（伴随着一种从功能性依赖 [functional dependencies] 中升起的异样的社会结合 [social cohesion]）的转变。

· 鄂兰区分了人类活动的不同基本形式。她从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即 *poiesis*（制作、生产）和 *praxis*（自由人或其灵魂的活动）出发发展出了三种类别：第一是作为服务于物种的物质性持存的活动的「劳动」(labor)，这一活动并不意味着自由，而只是维持生命所必须遵守的绝对律令。第二是与前者有着鲜明对比的「工作」(work)，即对日常所需的耐用物 (durable things) 的物质生产，后者伴随着一种对人类经验来说十分陌生的包罗万有的「人造」(artificial) 世界。第三是鄂兰认为与透过理解形成的社会多元相关的第三类活动，即「行动」(action)——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 *praxis*。在其中，个体能够在不从事「劳动」及「工作」的情况下生存，但作为一种社会存有 (social being)，此个体乃是本质上依赖于政治「行动」的。

· 哈伯马斯对比了两种人类活动：在劳动形式下面向功能性物质生产的「工具性的」活动，以及属于社会性生产的「沟通行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社会「生活世界」中社会性地不可或缺的理解导向的行动受到了主要在效率导向的「系统」(经济、社会)内实行的工具性行动的威胁。

即便「工作」(广义地说)表征了人类活动相当重要的部分，但人类的实存不能化约为工作。人类并非(似乎仍有人如此相信)主要是贪得无厌且生存于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痴迷于工作的生物。如此的观点无法捕捉到其它重要的人类活动之独特性。诸如「休息」、「娱乐」或者「运动」等范畴都试图地要合并此一「他异」(other)——然而往往在尝试规定精确定义之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比如就工作的运动和游戏方面而言)。关于工作概念的第一要务在于克服奠基在静态的真理宣称 (static truth claim) 上的二元观。于此更为相关的是基于灵活参数 (flexible parameters) 的关系性理解，后者帮助我们辨识「工作」在不同活动中所表征的特点。只有这样上述强调的现代工作的形式和观念的多样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來信寄至：

G. Günter Voss <info@ggv-webinfo.de>

> COVID-19 及 印度的移工

Rafia Kazim, LNM University, 印度, 教育社会学(RC04)、语言与社会(RC25)、女性与性别和社会(RC32)、视觉社会学(RC57)等研究委员会成员



在德里拉贾斯坦邦边境,于2020年宣布第一版本的隔离政策后,移民工人正返回自己的村庄。
来源:lbsar Hussain。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2020年3月24日晚上,印度政府突然宣布要进行第一波封城,这显示了印度政府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疫情及任何健康危机。在全国戒严开始前只剩四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让印度公民陷入了一团混乱。国家对移民者和城市贫民的漠不关心从实施封城的方式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没有考量到这会直接对日薪工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绝大多数人手头上没有任何积蓄,再加上面对不确定因素,挨饿的危机可能迫在眉睫,他们被迫返回家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进行第一波封城的第一周,就将近有 50,000 名移民开始起身从德里和孟买等大都市返回家乡。

一群步行数英里回家的移工在路上丧生的案例,更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危险处境。5月8日,16名睡在奥兰卡巴铁路轨道上的移工,遭一列满载货运的火车辗过。政府没有责怪那些无情殴打移工,并吓唬他们走另一条相对轻松的路线

的警察,而是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那些愚蠢到会睡在轨道上的移民们。返家的移民就这样死于远离家乡的过境路上,他们不是死于 COVID-19,而是死于政府的冷漠。

讽刺的是,对于「福利国家」而言,贫困人口仍然只是「标的人口」(target population),没有任何「合法公民」的感觉。国家为他们制定的福利计划很少,而且这也只有从他们那里获得政治收益时才会这么做。

> 典型的非公民!

移民的生活充满着艰辛与不确定性。形成这种不稳定基础的,是移民在一群充满敌意的城市居民中所体验到的疏离感。对于自称是公民社会合法公民的城市居民来说,移民是「无名的他者」(anonymous other),这是一群人口统计和实证类别下的人。人们虽然需要他们去清洁房子、城市,以及修建道路、桥樑和购物中心,但他们仍被视为会破坏城市景观美学的全民公敌而不受

>>

欢迎。正是这种国家及其「合法公民」的集体敌意性厌恶,使得城市贫民即使在一般时期也难以生存,而在自然的紧急状况下更是如此。这些移工作为「无名的他者」生活在城市空间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办法发展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

> 认同和归属

政治下的认同和归属可以显现出一个人是谁、不是谁。换句话说,可以指出一个人不属于哪里。对「家」的理解是由归属和认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而并不是仅仅由空间性或时间性来定义,所以即使在城市工作多年后,移民们仍渴望返回家乡。也因此,「归属」是指无意中创造的社会经济、文化、地区和种姓的界限。例如,在德里的一名比哈尔邦移民会开始意识到他是谁以及他属于哪里,这是因为多重边界的产物突显了他作为比哈尔邦人、移民、劳工、日薪工人、贫民窟居民等身份,既粗鲁又不干净,是城市空间的非法进入者。「德里的合法公民」会引用他们的地区认同(即比哈尔)去套用在任何类型的暴力、意外、事故或犯罪活动。这些「合法公民」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德里的合法所有权,并随之得到了德里的安全保障。

> 只是为了悲惨地死去?

根据 Judith Butler 的说法,「悲惨」(grievability)是一种功能,能够厘清谁算是人、谁的生命算是生命、谁的生命值得悲伤。由于移工和城市贫民是「无名的他者」,所以被认为是不值得人们悲伤的无名之辈。因此,他们认为死在自己的家(个人所归属的地方)会提高这种悲伤的程度。因为事实非常地明显,个人是依附于他人的「社会建构的身体」。因为失去伴随着转变,所以存在着失去。失去会给那些与逝去的灵魂有关的人们带来转变。明显地,对于这些移工来说,选择在哪里死去比怎么死去更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们的故乡里,他们的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悲伤至少会为他们赢得一些作为人的尊重,而他们也不会被视为无名、无家可归、可有可无的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数以千计滞留在印度各地的移工们,不计后果一定要回家的原因:他们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多重的威胁——疫情、饥饿、精疲力竭、警察的暴行。这表明了事实不仅仅



此图为隔离解除后,来自印度农村的移工居住在海得拉巴城市空间的情况。他们住在路边或棚户区、在建筑工地工作,同时也从事传统石磨产业。

来源:Rafia Kazim。

是经济上的不安全,移工担心他们的心理和社会安全。

一想到要死在 *pardes* ——外地/异乡,对移工来说这是心理上难以忍受的事情。一些移工说到,如果他们要死他们宁可死在「家里」也不愿死在城市里。用 Arjun Appadurai 的话是这么说的:「虚弱及不足的人类」(*infirm and insufficient humans*),这确实使这些人深深地害怕死去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哀悼。

> 结论

印度移工没有集体发言权,使他们失去了强大的议价能力。他们的工资在全球标准看来是倒数第一,而他们大多数人是靠着每天微薄的收入生存。

政府当下该做的,应是为移工订定全面的计划。此外,还应该让移民工人进行官方登记,并替他们建立一个数据库。政府须要对国内城乡的贫困人口保持敏感度,并引入和实施以村庄为中心的计划来优先振兴印度农村。移工的生命也很重要! ■

来信寄至:

Rafia Kazim <rafiakazim@gmail.com>

> 全球化脉络下的非正式及不稳定工作

Chris Tilly,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ISA研究委员会, 包括社会工作(RC30)、劳工运动(RC44)、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RC47)



「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体面的待遇,我的工作是无形的。」2018年,墨西哥城,家务劳动工人抗议。
来源: Georgina Rojas-García。

学者 Akua Britwum 回应国际劳工组织(ILO)官方所做的关于不稳定工作的报告道:「你们所谓的不稳定工作听起来就像在迦纳我们称为…的工作。」多年以后,另一位 ILO 成员对我提出:「德国工人所抱怨的那种不稳定工作,韩国工人求之不得。而韩国工人所抱怨的那种非正式工作,北非工人求之不得。」

非正式工作是一种自身合法但却远达不到或远抓不到标准就业法的有偿工作。所谓「远达不到」(beyond the reach)是指工作没有被那些法律所涵盖。自顾工人如街边小贩,还有许多被僱的——比如家政工人、农业工人和临时工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也都算作是非正式的。而「远抓不到」(beyond the grasp)是指在理论上法律应用,但在实践上却没有被执行。这包括许多较小企业——比如小型零售商店及餐厅——但也包括一些非常大的企业中的工人。非正式就业尤其不限于受非正式的、账外生意所顾的人员。比如在墨西哥,大多数非正式工人在正式的企业中工作。虽然非正式工作被视为对全球北方许多人兴趣有限的边缘现象,世界上多数的工人仍非正式地劳动,因此是时候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这些不正式工作以及如何得到改善的问题上了。

> 不稳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对性

不稳定工作和非正式工作都是被相对地定义的术语,因此有必要把它们放到国家的脉络下来看。十年前的一场会议中,我听到迦纳的劳工

那么这有何新奇的呢?非正式和不稳定并不是新的概念。事实上,早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工厂工人听起来很明显地像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非正式工作那样。这并不是说过去所有工作都是非正式的。世界上多数的工作是在一种劳动不自由的形式中进行的,而后者被一系列详细定制的规则——如动产奴隶制、契约劳工、劳逸、佃农等等——所统治。因此更精确地来说是,在马克思的时代里,不稳定及非正式工作的新形式已经升起并发展。

有鑑于此,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从来没有消失。举例来说,日本盛行的终生僱佣模式往往只涵盖了少数的工人,其中不包括女性、年轻及年长者、以及移民。即便在处于正式劳动的「黄金时代」的1950至1960年之间的北欧和美国或其它前英国殖民地,仍然有许多人从事非正式的和不稳定的工作。这几乎应用到所有的女性、年轻工人和移民中。这些移民包括跨境的和国内的移民:在我的国家即美国,那几十年来最大的移民群体是从南迁向北的六百万在地出生的黑人,然而透过入美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作计成立的二十二年里也引进了多达四百六十万的墨西哥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



2011年，Myrtle Witbooi 在国际家政工人联合会活动中演讲。Witbooi 是一名南非家政工人运动的领袖，曾从事家务劳动，目前担任联合会主席。
来源：IDWF。

新奇之处在于，对于1848年来说新的现象如今以其它的方式重复了——非正式的和不稳定的工作正向着过去没有发现的地方和人群蔓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非正式的和不稳定的工作是根据某些「标准」形式的就业而被相对地定义的。然而要是那些「标准」的就业异常地不再那么「标准」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雇佣了大部分劳动力（在印度超过90%）的全球南方尤为紧迫。在此真正的问题并非概念而是实践性的：我们如何捍卫因非正式化和不稳定化而降低的工作质量？

> 由不稳定的工人组织

解答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让涉及其中的工人来组织。马克思时代的非正式工人是有确定地组织起来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成立了一只持续到今天的工会。而如今的不稳定和正式工人同样组织起来，在合法的地方组建工会，还有协会、合作社或其它团体。事实上，这些工人近年来已取得一些全球工人阶级最伟大的胜利：比如 ILO 正式通过第189号公约承认了家庭工人的权利，或者印度最近的法律合法化了街头贩卖。

不稳定非正式工人的组织方式有三件特别与众不同的点。第一，他们与资本的关系往往很复杂。工人的真正顾者能够被层层转包所掩盖，或者工人可能主要是被势力庞大的供应商或中间商所剥削。在这些情况中大都具有相对较小的结构性经济槓杆作用——罢工在此可能不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且在很多情况下，政府都卷入非正式工人的剥削，比如美国政府制定了入美墨西哥短期合同工作计划制定条款，或者警察骚扰或勒索街头小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不稳定和非正式的工人往往以国家作为迫切要求福利及保护的对象。

第二，最集中从事非正式和不稳定工作的群体同时是以其它不同方式被边缘化的群体，尤其女性、从属的种族或族裔群体，还有移民。因此，他们像围绕其建立在工作上的身份认同一样围绕着上述这些身份认同进行着组织。

最后，他们寻求国家代表他们的利益行动，以及他们具有多样和交叉身份认同的事实意味着这些工人往往通过建立联盟来建立权力——比如女性运动、移民权利运动、族裔倡导组织及工会。■

來信寄至：

Chris Tilly <tilly@luskin.ucla.edu>



美国全国日间工作者联合阵线 (NDLON) 协同执行主任 Pablo Alvarado (最左) 与日间工作者和倡议支持者，于帕萨迪纳 (加州) 社区就业中心 (NDLON 附属机构)，2017 年。
来源：帕萨迪纳社区就业中心。

> 奥地利、德国、瑞士的照护争议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奥地利, 经济与社会(RC02)、贫穷及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RC19)、工作社会学(RC30)、女性及性别与社会(RC32)等研究委员会成员;**Helma Lutz**, Goethe University, 德国, 女性及性别与社会(RC32)、传记与社会(RC38)等研究委员会成员;同时为种族主义、国族主义、原住性与族群(RC05)研究委员会主席;**Veronika Priel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奥地利, 贫穷及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RC19)、女性及性别与社会(RC32)研究委员会成员;**Aranka Vanessa Benazha**, Goethe University, 德国;**Karin Schwiter-Jennifer Steiner**, University of Zurich, 瑞士

来源: Eva Langhans



20

> 老年居家照护:新的照护市场和不稳定的移工

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奥地利、德国和瑞士将面临越来越多所谓的「照护缺口」。随着人口逐渐老化,家庭内部的非正式照护能力也跟着下降,这是因为福利国家根据现今主要的成人工作模式重新进行了调整。与此同时,国家取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在长期的老年照护上。这导致了跨国家庭照护中介所筹划的营利性市场开始出现:照护工作外包给来自中欧和东欧等新欧盟成员国的循环式移民,而这些移民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这些照护工作者会住在老年人的私人住宅中照顾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生活数周或数月(居家看护, live-in care)。在这个竞争激烈且

快速成长的看护市场中,中介机构的角色影响力越来越大。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使以前的非正规部门正规化,但这并没有明显地改善看护的工作条件:居家看护人员通常需要24小时待命,而且他们的薪资远远低于当地的薪资水平。尽管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居家看护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新兴产业,但其具有差异性的规定仍给予了公众辩论和批评的机会。

> 奥地利:自僱下的照护人员

在奥地利,居家看护被列为一种自僱性行业。因此,工作时间或工资等规定不适用于看护人员。这种规定对于奥地利这个福利国家和每一户人家来说,是一种有弹性又相对便宜的解

>>

决方案。尽管如此,这种自僱模式仍然存在着争议。反对者认为(与这些参与独立市场的看护工作者所想的不同),机构严重地影响到了劳动条件。例如,机构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决定工作的出价和薪资。因此,这些自我组织的护理工作者们倡议要求废除他们认为是虚假的自僱工作。机构和商会们(他们正式代表了机构和工人)呼吁要进一步让现有的制度更加专业、有规范。机构可以自发适用的奥地利ÖQZ-24协定被视为是机构劝说下的成果之一。这份协定试图重塑市场竞争,有利于机构去建立最低的照护门槛。由于协定的目的在于提高照护的品质,而不是工作的品质,因此大多只是间接地影响劳动条件,而不是将其视为问题本身看待。近年来,工会和照护人员为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但迄今没有对照护工作带来太大的改变。

> 德国:派驻照护人员

在德国,除了普遍适用的法律外,并没有任何针对居家看护员的具体规范,这样的情况正反映在机构所涉及的众多法律框架之中。大多数机构采用派遣模式:护理人员受僱于派遣国的机构,而这些机构需要支付他们社会安全补助金。还有一点是,这些机构必须遵守德国的基本劳动条件规范(例如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但其实这些规范常常都会被规避掉。而这份照护工作的跨国性质和在私人住家工作等因素,也使得照护人员的劳动条件难以被确保。此外,工会代表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都批评了实际施行保护规范的难度,以及随后工人会缺乏社会保护的问题。实现法律的安定性也是看护产业的核心目标——这以商业利益协会VHBP 作为代表。此外,各机构也努力成为长期照护部门当中受德国官方公认的新支柱,为他们的利益保障争取立法。从这点可以解释为,他们正尝试从基层制度化整个部门。对于照护人员而言,社群媒体已成为沟通和非正式知识交流的重要工具——但迄今为止,德国的政治自我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 身为受雇者的的照护人员

在瑞士,居家看护是一种正式的僱佣关系。只有总部设在瑞士的机构才能派遣照护人员给

私人住家(派遣员工),或是由仲介安排照护人员直接受哪一户人家雇用(定职员工)。与奥地利和德国不同,瑞士的法律禁止自僱或派驻照护人员。此外,居家看护尚未被制度化为支撑长期照护体系中的支柱之一。国家的所给予的财政支援也只仅限于(医疗的)护理服务。因此,人们必须自掏腰包支付居家看护的费用。在劳动法方面,在私人住家工作的场合并不受《联邦工作法》的约束。这意味着居家看护者在最长工时或夜间工作上等情况,无法享受到与其他工人相同的保护。虽然他们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了最低时薪,但由于他们要24小时待命的职责并没有受到规范,使得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什么效果。近年来,监管部门和媒体一直在争论,该行业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已成了一个问题。与其他两个国家相比,瑞士的(自)组织和工会化的看护人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结论:居家看护本质上是一种充满困难的模式

最后比较这三个国家,我们发现——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仲介机构及其组织已经成为了能够形塑规范的强大涉入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仍听不见移工的声音。在瑞士的案例中,居家看护作为一种正规化的僱佣关系,正助长了工人和工会代表的基层组织,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居家看护的模式在本质上是建立在这三个国家的循环式移工,其高度不稳定的工作条件之上。此外,这种模式也减少了中欧和东欧可取得的照护资源。在这些见解之下我们必须警告,切勿再借由制度化居家看护的方式来支撑长期照护制度。这只是一种剥削性的应急方式。若想要持续地解决「护理缺口」的问题,须要从根本重新评估照护工作,让收入足以在当地生活的通勤劳工也能够提供高龄照护。■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Helma Lutz <lutz@soz.uni-frankfurt.de>

Karin Schwiter <karin.schwiter@geo.uzh.ch>

> 数位时代下工作的未来

Ruth Castel-Branco、Sarah Cook、Hannah Dawson,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以及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SA 劳工运动委员会(RC44)前任主席



2020年3月于南非约翰内斯堡, 校园广场中快递员的非正式工作区。
来源: Fikile Masikane。

许多人宣称, 数位劳动平台的崛起正在改变工作的未来。虽然一些人称讚「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远程执行、以网路为主的平台工作(「群众工作」)和在特定区域进行、以地域为主的平台工作—所带来的自由和灵活性, 研究却发现, 平台经济正使雇用临时工制加剧, 并将健康、安全等职业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许多讨论都预设数位平台正在创造「新的」工作种类。然而, 这些工作绝大多数都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计程车、餐厅外送服务和家庭清洁工。那么, 这些新兴的零工类工作哪里「新」呢? 数位平台又是如何改变正式与非正式劳工的含义?

> 南方世界的平台工作有什么「新」的?

在南方世界的经济体中, 最大的特点可能是高度的非正式性。在「新」形式零工工作所发生的环境中, 非正式工作关系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数位平台劳动力的报告指出, 以非洲为例, 超过80%的人口主要倚靠非正式工作谋生。

非正式工作关系的定义, 一直以来都是透过与正式工作比较而来—例如, 临时而非常规的工作、书面和标准合约的缺乏、没有社会福利或保护, 以及缺乏集体性组织和代表。实务上, 非正式

工作所涉及的各种活动, 其特征为多样化的就业安排。Chen¹将这些人归类为掌握生产手段、自主经营、直接向市场销售商品的自营工作者; 嵌入雇佣关系中的自营工作者, 伪装成商业关系; 另一类则是雇佣劳工, 由于雇主逃避而被排除在劳动和社会保护之外。性别、种族、其他结构性等级制度因素, 通常反映在这些类别中: 因此, 男性倾向于主导收入较高、陷入贫困风险较低的自营工作, 而女性则集中在低收入的活动。

平台工作重现了很多非正式的特征。从事平台工作者很容易被错误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 因此无法获得给薪休假、福利(包括产假福利)、社会保障或职业及健康保险。然而, 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平台, 对应用程序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确实, 如 Webster 和 Masikane²所呈现的, 员工受制于应用程序的「权威型演算法管理」, 它可以分配任务、追踪绩效、决定薪资, 甚至可以单方面终止雇佣关系。

以地域为主的工作(例如外送)主要由年轻男性从事, 特点是工时长、需要面对面的接触。虽然薪水低, 所得还是比其他替代方案好; 且因为需求和供应皆源自当地, 更有利于劳动者的集体组织。相比之下, 以网路为主的工作(例如编辑)由南方世界的隐形工人所承担, 其客户则多数来自北方世界。由于工时短且灵活的特点, 这类工作更多的是吸引必须兼顾生产(物品)和生育的女性。

数位平台虽然多样化，却也高度集中：前述的 ILO 2021年报告显示，由数位平台所产生的收入当中，有70%来自美国和中国。虽然这可能会损害全国的中小企业，但它也创造了新的权力来源。在南非豪登省，Uber Eats 外送员正在筹措混合型组织，它起源于全国性的离散互助协会，但如今已发展成区域性的网路。他们透过 WhatsApp 连结彼此，开创了一系列的数位直接行动，包括以集体登出的方式达成罢工。同时在哥伦比亚，Rappi 的外送员在 NGO 和中央总工会的支持下，开发了一款工会应用程序：UNIDAPP，并成功参与了一场针对跨国平台的跨国直接行动。³在乌干达，合并运输和劳工工会支持开发了一款为 Boda-boda 司机设计的应用程序，大幅地扩张了它的成员，并改善了司机的工作条件。

虽然对非正式经济的介入通常仅针对企业发展，ILO 第204号公约却强调了一股不断提升的共识，亦即这些介入必须将得来不易的劳动和社会保护，扩展到非正式劳工身上。在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Uber 司机有权享有给薪休假、最低工资和养老津贴。在南非，竞争委员会也针对平台对中小企业影响展开调查。

> 未来会怎样？

两条广泛的途径可以确定：外资科技巨头支配地位的深化，且无论在国内或全球都尚未决定如何运作。这会创造一些非正式工作，但劳动者也将被困在低薪的苦差事中，无法得到正式就业的保障和福利。由于利润和税收保留在国外，这可以被视为是重新殖民南方世界的一种形式。

另一种途径可以是「数位社会契约」，由平台工作人员和其组织积极参与下所创造。这将涉及全球和国家政策的连贯性，包括立法保护这类劳动者。这种乐观的途径，开启了将劳动和社会保护扩展到非正式劳工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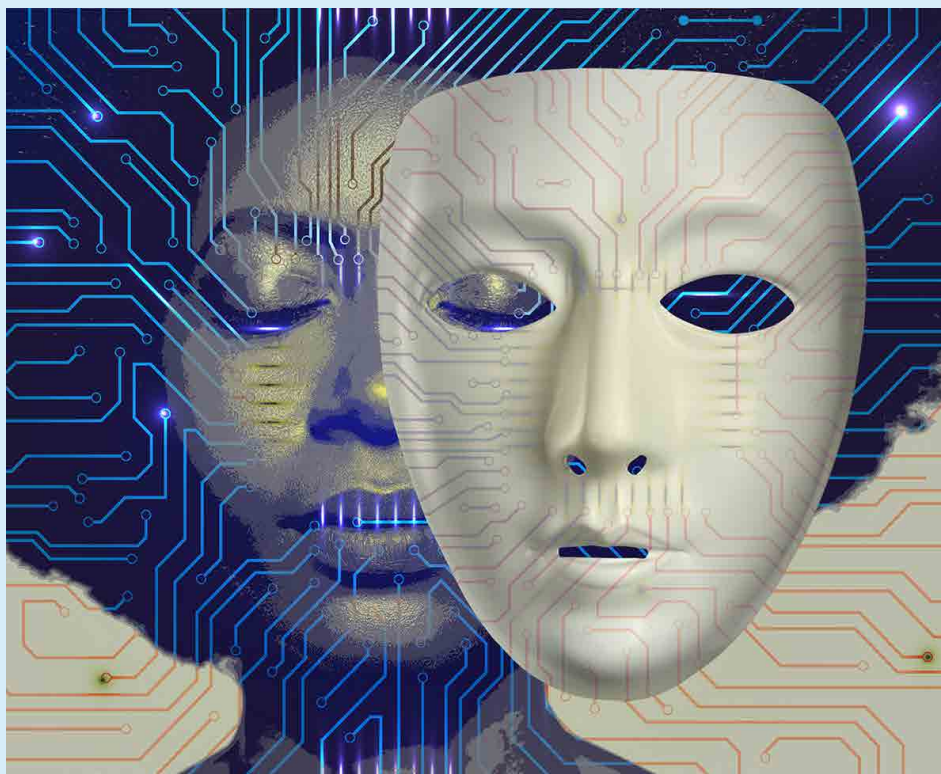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Ruth Castel-Branco <Ruth.Castel-Branco@wits.ac.za>

1. Chen, M. (2012) 〈非正式经济：定义、理论和政策〉，WIEGO Working Paper，捲一。
2. Webster, E 和 F. Masikane (2020) 〈我只想活下去：以约翰尼斯堡的食品外送员为例〉，Southern Centre for Inequality Studies。
3. Velez, V. (2020)〈这不是童话故事：独角兽与哥伦比亚对零工劳工的社会保护〉，SCIS Working Paper，捲七。

> 破解演算法控制

Sandiswa Mapukata 和 Shafee Verachi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以及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和 ISA 劳工运动委员会(RC44)前主席



| Arbu 绘。

正义联盟是一群超级英雄，成员包括（但不限于）蝙蝠侠和神力女超人，他们试图从超级反派达克赛德手中拯救虚构的世界。[演算法正义联盟](#) (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 AJL) 成立于 2016 年，同样追求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尤其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AJL 着重于提倡对抗演算法控制的四项关键原则，亦即积极同意、有意义的公开透明、持续监督和可问责性，以及能被起诉的批评。

虽然被贴上了「人工智能」的标籤，但它绝不是人造的；正如 Kate Crawford 在《AI 图鑑 (The Atlas of AI)》中所说，「AI 既是具体的，也是物质的。」正是人工智能的这种物质性，对劳动者的控制才得以浮现，我们把这种控制的形式定义为演算法控制。在本文中，我们将演算法控制概念化，并探讨它如何影响劳动者，以及他们如何开始抵抗。总结时将会针对劳动者主导的抵抗提出一些建议。

> 什么是演算法？

在世界各地，许多种利害关系人（包括政府、学者和运动者）都在设法对付演算法控制的系统，是如何重塑世界。演算法的存在是无形的，尽管它的存在和使用会产生物质性的后果。演算法是一套程序／需要被遵守的指令，用以计算或其他解决问题的操作，尤其是透过电脑。如云端运算这种技术的崛起，使透过网路（如亚马逊网路服务）提供计算服务成为可能，也使组织和企业得以自动化某些营运层面。有些人认为演算法是中性的。然而，愈来愈多工作（参见 Ruha Benjamin《技术后的种族》）展示演算法由于被人类程序设计师编码、实务操作时的依据来自一组规范和指令，因此也可以存在偏见和歧视。如果偏见被餵进演算法中，演算法就会将现有的歧视模式自动化。这点在现今的生态、由白人男性经营的大型科技公司的中尤其如此。Safiya Noble 在她《压迫的演算法》书中，探讨 Google 的演算法如何歧视性地针对黑人妇女和女孩。

>>

> 演算法控制——现实

演算法深入控制工作的程度，更甚于工业化历史上任何时候。透过在劳动过程的核心引进演算法，建立了它的控制和获利最大化。这是马克思所说「命令的增值(valorization in command)」的一个例子。这些演算法被用来计算劳动者完成工作的速度。如果平台工作者的工作表现，没有达到演算法的标准，管理阶层有权立即修改劳动者赚取的报酬和/或将他们解僱(停用或中断他们的帐户)。2020年12月，南非约翰尼斯堡的 Uber 司机发起抗议，手段为删除 Uber 应用程序、不接受乘车请求。这些司机的诉求包括：他们的账户被 Uber 封锁的过程模糊且不公开，以及司机赚取的费用多寡由 Uber 单方面决定并实施。

在《工作的 Uber 化(The Uberisation of Work)》一文中，Edward Webster 认为对于像 Uber 这样的公司来说，演算法使他们得以专注于高附加价值活动，同时透过技术的支持来实现外包和分包，进而脱离主流就业市场中，雇主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些公司展现了垄断的倾向，同时得以绕过一般的公司治理和就业模式。

> 演算法控制 - 反抗

虽然演算法控制看似难以克服，雇员们自己却也正在使用演算法来争取控制自身的工作条件。经过谈判，西班牙通过了骑士法，认可了外送骑士们是数位平台的僱员。此外，数位平台必须对其演算法如何影响工作条件保持透明。在讨论演算法控制及针对演算法的反抗时，消费者的角

色也十分重要。借由演算法对个人资料的挖掘，消费者也成了价值生产者。科技巨头的消费者在使用各种平台时，也可说是在进行着无偿的劳动。这使消费者的地位更接近于劳动者，而不是科技巨头公司的经理。

在分析这些对科技巨头演算法控制所进行的反抗时，研究者还必须考虑空间的重要性。演算法控制系统在不同空间脉络下具有特殊性。考量这些差异、超越国家层次，是很重要的。有鑑于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这两种脉络都能提供重要的特殊性，可以强化抵制各种形式的演算法控制的对话。这在我们思考如何制定劳动者优先而非企业优先的未来工作概念时，将会至关重要。Cathy O'Neil在《当数学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写到：

「大数据流程编纂过去。它们不会发明未来。发明未来需要道德想像力，而这是只有人类才能提供的。我们必须明确地将更好的价值嵌入我们的演算法中，创造遵循我们道德准则的大数据模型。有时这意味着将公平置于利润之上。」■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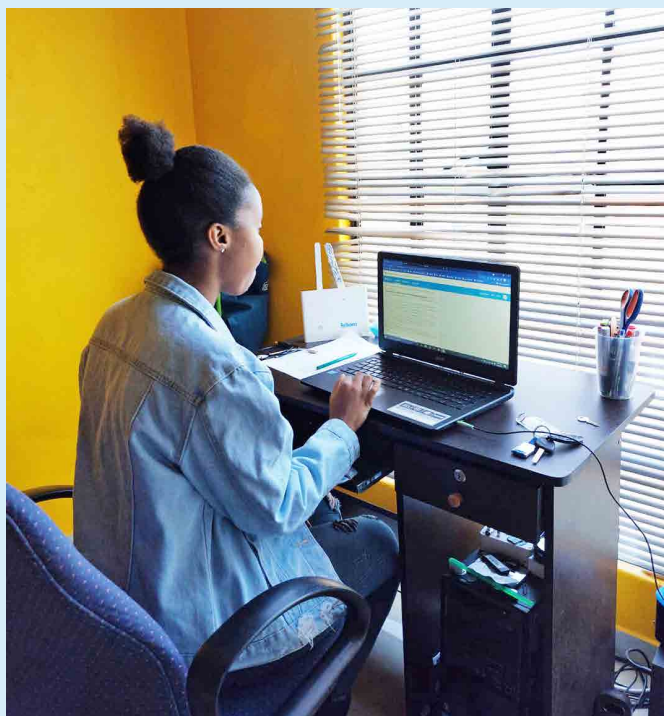
Sandiswa Mapukata <sandiswa.mapukata@wits.ac.za>

Shafee Verachia <mohammed.verachia@wits.ac.za>

Edward Webster <Edward.Webster@wits.ac.za>

> 线上劳动平台： 无法被制衡的权力？

Kelle How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国, Patrick Feuerstein, 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德国, Funda Ustek-Spilda,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国, Alessio Bertolini,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国, Hannah John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国, 以及 Mark Graham, Oxford University, 英国



线上零工工作者或「云端工人」借由平台与客户联络，而平台则从交易中抽取佣金，并通常对于劳动过程有高度控制。

来源：Fairwork Project

COVID-19 大流行使知识工作者远程工作广泛地成为常态，伴随数位工具的进步促进这种转变，包括通讯、视讯会议、演算法管理和工作分配，乃至对劳动者的监控。正当大流行使人们更加关注并加剧了劳动市场中许多先前便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时，一个明显的区别逐渐浮现：那些能够轻松转换为远程工作的职业、无法透过远程完成的低薪服务类工作、那些面临接触病毒双重风险的劳动者、隔离期间的收入损失。

虽然这些不公平的劳动市场分层——具有远程工作能力的人和必须亲自完成工作的人——自从大流行开始以后可能变得更加严峻，但较少被讨论到的，却是并非所有远程工作者都得以享有相对的安全。事实上，从 COVID-19 出现以来，线上零工经济可说是蓬勃发展。然而当这种形式的劳动为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时，它们的处境却依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

> 云端工作的劳动控制

线上零工工作，与「受地域限制」的零工工作如叫车、送餐和清洁（较为人所知的例子是 Uber、滴滴出行、户户送），有着清晰的共同特征。线上零工或「云端工作者」透过平台接口与客户联系，这会从每笔交易中抽取租金，且通常对劳动过程施以高度控制。平台控制了工作如何被完成，包括透过演算法管理进行任务分配、支付和纪律处分等。就像他们从事受地域限制工作的同行一样，合约将这些劳动者划分为独立承包商或自僱者，从而将他们排除于多数司法管辖范围的重要就业保护之外，如最低薪资、病假给薪、育婴假和退休金。

然而，和计程车、外送和清洁部门的同行们不同，以云端工作平台作为媒介的工作，理论上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透过网路连线执行。它们促进了一个复杂的跨边界联系网路，并已被理论化，足以创造一个全球规模的劳动市场。这种动态为劳动者创造了崭新的机会，但它同时也增加了漏洞，以特定的方式使劳动者陷于风险之中。

>>

首先，平台在无数个司法管辖范围间不断调解劳资关系，这使得它们难以被规范限缩。他们拥有非常少的固定资产，并与劳动者保持合约的距离。这种流动性和短暂性意味着他们可以逃避保护劳动者和大众的地方立法，以及税收和竞争制度。

同样的动态也有助于压抑劳动者的结构性权力。当劳动者是孤立的、地理上分散的，并基于平台的设计而相互竞争时，他们就很难进行组织、团结并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将促进集体谈判的国家管理框架套用在全球线上劳工平台上也十分困难。云端工作缺乏正式的劳工结构和公共问责，这给予了平台巨大的权力来决定条款、塑造工作条件，并在最终按照自己的意愿，负责任或不负责任地行事。

大多数云端工作平台的加入门槛比一般就业低。这可以为那些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人，提供一个急需的机会——如南方世界的劳动者、承担较高照护和家务职责的人（主要是女性）、移民工人、少数民族社群和障碍人士。然而，多数国际云端工作平台都引进了过多的劳动力。这有助于客户快速轻松地找到劳工，但也意味着劳工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受到抑制，因为他们正为了数量有限的工作进行激烈竞争，且竞争还逐渐增加中。

在任务以极短期为主的云端工作平台，又称为「微任务」平台（如 Microworkers、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和 Appen），劳动者可能会参与更大的项目，例如对数据进行分类和标记，以训练机器的学习系统。这种大项目被分解成数个极微小的任务，可能只要几秒钟就能完成。在这里，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一个客户完成一个项目。这种极微小的外包，可以完全模糊化最终产品所需的劳动条件，进而造成**云端工作的隐形**，并侵蚀了劳动者的权力，特别是因为个别劳动者很容易被解雇和替换。

由于云端工作者很难发挥集体力量，而且他们通常不受国家层级立法的保护，因此他们的日常工作条件仍然不稳定且充满风险。大多数云端工作平台允许客户拒绝劳动者可能已经完成的

工作，有效地允许了不付款的发生。平台可能让劳动者有能力对抗被拒绝，但这是可以斟酌的，通常涉及艰苦的自动化流程，这比完成另一项工作需要更多时间，且因为他们拥有的劳动者比客户多得多，所以平台通常站在客户的一边。

线上劳动平台的劳动者也面临着健康和安全风险，包括暴露于具象的或心理上令人感到不适的内容，以及他们的隐私风险，或数据保护措施的不足。

最后，劳动者很容易受到客户歧视，包括基于性别、种族或地理位置相关的预设或偏见，所引发的歧视。

> 保护云端工作者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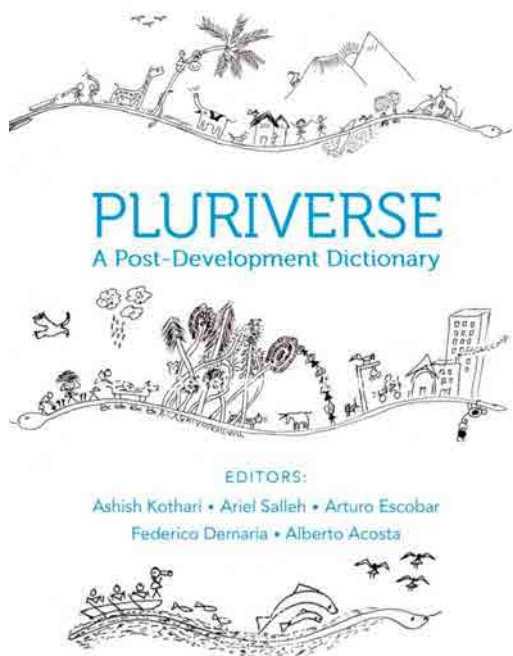
在缺乏能够驯服平台权力的国家或国际监管方法，进而造成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的障碍之下，远端零工工作条件的风险和剥削激增。COVID-19 大流行使没有安全感的劳动者纷纷涌向远端工作和线上劳动平台，因此更需要基层劳工力量和政策解决方案来保护这类劳动者。公平工作项目(The Fairwork Project)与劳工和专家共同制定了一系列公平云端工作原则，作为这些努力的基准和参照点。这些原则涵盖了上述各方面的风险和伤害，分为公平给薪、公平条件、公平合约、公平管理和公平代表等类别。我们根据这些原则对17个著名平台进行了评估(评分)，以呈现目前线上零工经济中劳工实践的范围。虽然少数平台获得了相对正面的评估，最终我们的研究发现，基于问责的缺乏，平台不断做出对数百万劳动者的福利和生计产生影响的选择(经常是负面的)，所需的只是一行简单的代码。第一个公平工作针对云端工作的评分，志在凸显这些严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并透过未来的年度评分机制，我们希望一同努力，为远端零工工作者带来更公平的未来。■

来信寄至：

Kelle Howson <kelle.howson@oii.ox.ac.uk>

> Holding 作为劳动与认识论

Ariel Salleh, 访问教授, Nelson Mandela University, 南非, ISA终身会员



《多重世界：后发展意义下的词典》，Tulika Book (2019)。

欧洲中心主义对于「支配自然」的幻想一直是一种有问题的本体论。而物质和母体(mater, 拉丁语)之间的原初连结并不是巧合。早期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将支配的文明驱力视为一种弑母的昇华, 让男人能在文化上生产, 而不依赖神秘的自然流向。今天, 这种将自然外化的心理分离使新自由主义权力、战争和现代科学得以实现。学术界中的恋母情结能否接受这一点?

> 重忆

在任何情况下, 当代表「他者」的古老文化建立了一个物体和抽象化的世界时, 它的镜像仍然是感性的, 可以被称之为「Holding」。Holding指向人类与自然界新陈代谢的镶嵌; 它映照了在母亲的怀抱中型塑自我的最初时刻。当人们能够感觉到自我与自然的镶嵌, 正如新唯物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 他们很容易理解所有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然而, 我并不被这种说法所吸引; 相反, 我认为 Holding 是一种劳动形式, 是繁衍性的, 而不同于生产性的。审慎的

Holding为生物物理过程提供了能量, 比如对孩童的照护或原住民对林地的保护。Holding传授的是一种既草根又具系统性的认识论。

在我们编辑的文选《Pluriverse》(2019)中, Karin Amimoto Ingersoll 描述了夏威夷渔民的这种感知能力:

「一种关于海洋、风、潮汐、海流、沙、海草、鱼、鸟和天体等非工具导向的知识, 作为一个互相连结的系统, 允许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世界中移动……在这种海洋知识中, 身体和海洋景观在一种复杂的对话中互动……作为使我们与『自我』分离的, 西方思想世界宏观叙事的替代……因此, 观看成为一个政治过程, 是对我们从海洋时序和宇宙中所学习的所有记忆与知识的解读, 但它们已被认同、地方和权力的僵化殖民结构所抹去……(太多的)世界没有记忆的深度, 仿佛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是空白的地貌, 因此可以消费和发展……」

> 价值再生

正如《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述, 基督教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历史性的镶嵌框架。随着全球企业和多边机构的崛起, 照顾者、小地主和原住民的他者化知识被贬抑为「文化的」, 而不是「经济的」。这使得他们敏锐且永续的生产方式在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论述中被忽略, 而同时政治上的右派和左派也都认为劳动必须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 「真正的工作」是将物质转化为「人造的」物品, 从而具有「价值」。甚至进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例如绿色新政支持者, 和政治经济学家也从量化方法上争取将照护工作重新放置在正规经济的位置。与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与交换二元论不同, 生殖或「新陈代谢」的价值不需要衡量, 它是随着生态系统的繁荣和人的身体发展而经验的。

在没有剥削、开发主义、生物多样性丧失、用水高峰和气候变迁的情况下, 有很多方法可以满足

>>

足社会需求。自1999年西雅图人民核心小组以来，资本主义父权帝国已经受到了世界社会论坛、农民之路、原住民环境网路、世界女性大游行和反抗灭绝等运动的挑战。这些倡议从 Ivan Illich 和 Wolfgang Sachs 这样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以及 Maria Mies 和 Vandana Shiva 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灵感，他们对「不良发展」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批判。2019年多重世界(Pluriverse)计划，在安第斯山脉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倡议者、印度的自治(swaraj)社区、欧洲的去增长运动者以及其他一些人们之间，开启了一个跨文化的交流，并呼吁「全球就是在地」。转述自 Manfred Max-Neef 所说：「小型自我管理的经济体是『协同的』，同时满足许多需求—生态再生、日常生计、学习、创新、认同和归属感。」

> 结构性相似

家庭主妇和农民在邻里和村庄阻止杀虫剂的使用或采矿，这些持家劳动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因此，这些工人也注意到自然与妇女、原住民身体的商品化之间的结构性相似之处。在世界性的运动中，全球北方妇女的政治选择与全球南方种族化人民的选择基本相同。要么通过法律权利的公民机制获得解放，要么通过社区互惠获得自我实现。

在二十一世纪，许多人正在采取重大的文明措施，将人性和自然重新结合起来。新水资源典范(New Water Paradigm)的整体科学或自然母亲权利(Rights of Mother Nature)的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就是这种重忆的典型。粮食主权是北方和南方普遍活动的核心目标—但不要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FAO)的「粮食安全」概念相混淆。后者只是带来了更多的暴利，剥夺了生计，石油养殖的单一作物，以及污染性的跨洲自由贸易。主流的女权主义者，以及一些左翼运动者和绿党人自信地谈论着调整主流的资本主义典范。然而，国家权力往往以一种压迫性的妥协形式来安抚善意的变革行动。这在循环经济、绿色协议和地球系统治理中已经可以看见。

> 一个生物文明？

世界各地以「公平和永续分配」为名的社会产品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却没有热力学意义。正如 Jason Hickel 所指出的：为了实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全球经济将不得不增长到目前规模的175倍，因为它已经每年超出地球可承受度的50%。家计经济是在与在地生产的公共性中，尊重自然界的物质限度。这种人民的典范达到了一个「生物文明」，以取代孤独的高科技个人主义和疫病国家剥夺生命的公式。与「我思故我在」中分离的「思」(cogito)相比，南非的乌班图(ubuntu)伦理的前提是「我在，因为你在」的Holding逻辑。相关的世界观有美好生活、生态村、礼物经济、共生(Kyosei)、感觉思考(Sentipensar)，现在正在彼此对话中，成为全球替代方案的织锦。

生态社会主义者能否「重新体现」他们的唯物主义，并考虑一个「他者化」劳动阶级的历史能动性，一个来自资本的国内与地理边陲的「元产业」？在这里，在理论的边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人，他们满足了所有阶层的物质需求。事实上，他们甚至通过将人类—自然的新陈代谢结合在一起而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这个全球阶级不需要垂死的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的严格抽象，主体超越客体、人性超越自然、男人超越女人、白人超越黑人、经济超越生态。¹■

来信寄至：

Ariel Salleh <arielsalleh7@gmail.com>

1. 此处文字改写自2021年6月于巴黎的讲座《Femmes, écologie et engagements politiques du Sud au Nord》。

译注：Holding在本文中具有多重意涵，译者认为以一个同一的词汇将其翻译至华语的脉络是困难的，以此在本文中不多做翻译。Holding 在文中具有「与自然镶嵌」的意义，同时也可以理解成从基督教父权资本主义中「拥抱」、「维持」或「保护」某些事物，互为主体地在劳动过程中给予能量并使其不被破坏、永续发展的形式。

> 宫崎骏动画：人类世的万物有灵论

Shoko Yoneyam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澳洲



《龙猫》(1988)。
来源：吉卜力工作室。

人们普遍认为，为了解决气候变化、COVID-19以及其他与「人类世」相关的生存危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我们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也许我们需要设想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Amitav Ghosh认为我们正在遭受想像力的危机，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文化架构参考，使我们能够想像另一种本体论。万物有灵论是否有可能帮助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但万物有灵论不就是「原始人」的「简单信仰」吗？比如远离现代的猎人？这就是万物有灵论在西方正统观念中的典型框架：它基本上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论。「新万物有灵论」是最近的一个思想流派，它采取了一种更正面的观点，将万物有灵论作为对现代性的一种有利批判。然而，新万物有灵论的全部承诺还没有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万物有灵论在西方大学内的人类院系所仍然处于标本式的地位。

> 宫崎骏动画的全球流行

宫崎骏，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电影导演，在激励人们深刻地面对人类世生活中充满挑战性的现实上发挥了珍贵的影响。他的动漫作品中所呈现的万物有灵，能够打入数百万观众的心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积极的重新想像。宫崎骏的动画片以极易理解的万物有灵论的图像和故事激发了我们的想像力。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几年前，我在会议上发表论文提出同样的观点时，一位同事惊呼：「宫崎骏的动漫是小孩子的东西。我儿子五岁时就看了《龙猫》。」这是真的：宫崎骏的作品主要是为儿童创作的，但也由于他的电影，吉卜力的前联合导演高畑勲说：「日本儿童只要看到树就能感觉到龙猫这个树精。」对全世界的儿童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自1996年迪士尼开始发行吉卜力电影以来，宫崎骏动画的全球影响力成倍增长，《神隐少女》于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奖，而且这些电影开始在 Netflix 和 HBO Max 上播放。

> 批判性的万物有灵论

那么，宫崎骏动画在全球的流行与「人类世」有什么关系？

宫崎骏动画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表现，特别是在他的标志性电影中，如《风之谷》(1984年)、《龙猫》(1988年)、《魔法公主》(1997年)、《神隐少女》(2001年)和《崖上的波妞》(2008年)，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重新想像人类与自然关系。

重新想像？日本的情况则不同，那里的万物有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与现代性并行。在那里，万物有灵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我认为，一种新的



《魔法公主》(1997)中的木灵。
来源：吉卜力工作室。

万物有灵论已经演化为对现代性消极层面的回应，并「强化」（如神奇宝贝的进化），形成对现代性的反身性批判。这就是我所说的「批判性万物有灵论」或「后现代万物有灵论」。

批判性万物有灵论是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污染案例之一的受害者，水俣病患者的叙事中演变而来的，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电影观众可能对 Johnny Depp 在2020年的电影《恶水真相》很熟悉，这部电影描述了摄影师 Eugene Smith 的生活，他拍摄了标志性的照片「洗澡的上村智子」。

社会学家鹤见和子首先观察到，这种关于万物有灵论的草根语言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我在《当代日本的万物有灵论》¹一书中对鹤见的「万物有灵论计划」进行了研究。我在书中研究了四位杰出日本知识份子的生命叙事，宫崎骏是其中之一，我并在书中探讨这些创造性的思想家是如何提出「万物有灵」可以拯救世界的想法。

宫崎骏坚持认为，需要万物有灵论来拯救世界。因此，推广万物有灵论是他的生涯规划。他作品的哲学基础可以在《风之谷》的漫画版中找到，这是一个超过一千页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史诗故事，他花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1982-94）。

宫崎骏的（批判）万物有灵论由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对被赋予能动性的，对于自然的美丽描绘。自然被呈现为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非二元组合，正如《魔法公主》中森林精灵 Kodama 所象征的那样。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地点和地方的意义，这使他的万物有灵论有别于国家主导的日本万物有灵论的意识形态和利己主义语言。他对万物有灵论的定位为其与其他地方的万物有

灵论松散地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以形成 Arif Dirlik 所说的「跨地方的联盟」。第三是对二元论的否定，如人/自然、善/恶、生/死、精神/物质、看见/不被看见、光/暗等，这具有强大的理论意义。

宫崎骏的万物有灵论在理论上是激进的，因为它挑战了社会科学和现代性典范的既定前提，这些前提都是基于阶级性的二元论：一、人类高于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二、理性高于精神（世俗主义）以及三、欧洲传统高于其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换句话说，他的万物有灵论颠覆了现有的典范。它提出了一个潜在的可能，在一个新的方向上激发我们的想像力，以设想一个不同的典范，能够摆脱阶级性的二元论。详情请见我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发表的论文[《宫崎骏的万物有灵论与人类世》](#)。

有了这些理论意义，宫崎骏动划的全球流行建构了一个显着的社会学现象。如同龙猫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树的种子，宫崎骏将强大的万物有灵论形象投射到数百万观众的心中。宫崎骏作品的大规模流行，可能表明人们对他的万物有灵论立场直觉的掌握或渴望。有可能在他的电影中，一个重新被施了魔法的世界使观众（包括社会科学家）对万物有灵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有了更多的认识，以一种纠正 Ghosh 想像力危机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宫崎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故事」，以应对人类世的「完美风暴」。■

来信寄至：

Shoko Yoneyama <shoko.yoneyama@adelaide.edu.au>

1. Yoneyama, S. (2019) *Anim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Voices for the Anthropocene from Post-Fukushima Japa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人类世及其争议

Gaia Giuliani, 社会科学中心,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維德角。
來源: Gaia Giuliani。

近年来,将「人类世」视为一个概念、过程和现象已成为政治界、艺术界、文化界和学术界等领域之争论核心。颇具争议的是,其最主要的意涵指的是学者们认为第二、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地球因人为干预对地质、物理和生物组成所造成之重大影响。

> 对人类世理论的批判性观点

在较具批判性的观点中,「人类世」和有关于它的公开辩论有助于重新定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根据这些批评,人类世是一现代事实)及从那时起开始享有特权的人类、非人类和无生命物之间的关系。这种概念重构发生于对权力结构的彻底反思,在行星尺度上控制有机和无机元素。

上述立场在反资本主义和去殖民观点的交织上萌芽并深入其他学界,从全球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等跨学科领域的认识论,到

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和物理学甚至电影、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诗歌和表演艺术等领域。它们借鉴了环境人文领域中的跨学科对话所发展出的两个重要思想:一、环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二、为了扭转「人类世」对任何生物的剧烈影响,必须承认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及无机组成物之间有具有政治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

> 人类世的人类及其怪物化

这篇简短的文章源自于这些批判性的反思,着重于人类世与想像、修辞和实践的符号生产力有关之特征,以及源自一个集体性的超验主体(Foucault)并可以被定义的人类世的/在人类世中的人类的司法、政治和流行文化。

正如 Elisabeth Povinelli 所强调,此人类学涵盖后殖民和去殖民主义批判中的笛卡尔主体以及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人,被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与重塑世界的暴力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

现代性的突现有关。依附于这个人类学的是世界、历史、地理和人性的愿景——在符号学上构建身与心、人类与非人类、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非白人、好和坏、理性和非理性，世俗与宗教狂热、对与错、优与劣、拯救的和致命的作为分离的整体——自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中世纪前提以来，就已强加了维持和复制资本主义及其暴力的本体论和逻辑。

借由将人类世的逻辑和本体论与种族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殖民主义之间纠葛的理论与反思结合，我将探讨历史洪流下所产生的「怪物化」论述过程在构成人类世的「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在权力结构和价值提取中心创造霸权的「我群」做出的贡献，这些都是源自于资本和殖民主义的现代性。此调查将揭示人类世本体论和其逻辑运作的跨时空合法性，并将通过道德恐慌之论述建构与殖民暴力、国家威权主义和致命的开发主义揭露怪物化过程与针对殖民叛乱者、逃亡奴隶、狼人、女巫、异教徒、暴乱农民、罢工工人及原住民抗争等暴力之间的连结。

在我最近的著作《怪物、灾难和人类世：后殖民批判》中，我通过对现代怪物和灾难概念的后殖民调查来探索欧洲和西方对自然灾害、大规模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想像。在科幻、末日和恐怖电影、电视剧及新闻媒体转载的图像中，流行视觉文化的既定图示有助于将现代恐惧的谱系追溯到人类世的本体论和逻辑。此书并没有止步于揭示人类世的内在暴力，而是进一步提出一种女性主义、后发展和生态学的认识论，以及一个包含「新政治」概念的政策。

> 因应现今社会的女性主义政治路线

我建议可提出政策由相互依存照护、自我照护以及地球照护三面向来回应人类世的逻辑与本体论。我借用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中，照护的核心理论，也就是个人与群体的福利（生理、社会、文化、性别与经济上）。尽管如此，照护问题还是可以通过酷儿、原住民、黑人和工人阶级妇女理论的批评来解读。借鉴 Sara Ahmed 和 Audre Lorde 的表述，我认为女性主义项目中的自我照顾概念可作为一个整合个人和集体自

治，并以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相互关怀为前提，而不是由父权、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别角色构成。

人们居无定所、少数群体的去殖民和反父权斗争，以及在地和原住民族对抗环境灾害与新殖民主义证券化所展现的复原力和抵抗力；在这样的脉络下，自我照顾意味着个人和群体的自主、自我保护和团结一致来反对国家的监视、规训和虐待。这项政治项目包含相互依存的关怀、自我关怀和对地球的关怀，并将反威权与反殖民主义结合起来，以用来对抗开发主义、剥削和环境脆弱化。该项目基于理解使用城墙和边境、社区警政和监狱群岛、监视系统、监禁和强制移动这些手段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都是种族主义外，同时也知道种族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殖民性（Cedric J. Robinson、Ruth Gilmore、Laura Pulido）与地球的关系完全是建立于利润导向上。

因此，这种反殖民基础的政策必然是反开发主义的，并且基于地球上所有人类、非人类和无生命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这样的概念将地球关怀的问题推到台面上，即反资本主义与地球上所有组成物之间的关系。借鉴库德族 jineolojî 的原住民多重世界，政治运动的认识论，以及西方学者像是 Donna Haraway、Stacey Alaimo 以及 Karen Barad，这项计划将照护的理念延伸至非人类的生命。唯有通过关怀、自我关怀和地球关怀的三位一体，人类对人类、非人类生命以及非生命的责任才成为了一种政治价值。

许多南方国家与原住民社群边缘化了北方国家的住民，且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都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只有一个地球激进的政策注意到人类世逻辑和本体论中的致命怪物，认知到以置位与不可或缺的多重性来回应，并可以主动地做出对比。■

來信寄至：

Gaia Giuliani <gaiagiuliani@ces.uc.pt>

>帝国生活形式与资本主义霸权

Ulrich Brand, University of Vienna, 奥地利, 以及 Markus Wissen,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德国



此为众多案例的其中之一：全球北方的牛油果大量销售，导致了全球南方的大量水资源流失。图为南非的一种年轻、高密度的植物。
来源：Edrean 2013 / 创用CC。

34

批判性社会／社会科学式的思考，在处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变迁与危机等主题上，有着深厚的理论传统。相较于经常忽视问题根源的主流社会科学，批判理论的分析取径则善于由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以及争议性质切入问题。「帝国生活形式」¹的概念所强调的，是透过关注当代的重大挑战——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历史／现今社会中的矛盾。

如今已根深蒂固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在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佔据了主导地位，其是以全球规模的劳动、自然资源的过度取用为前提。这导致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生态汇的过度扩张、多国出现高失业率和失去平衡的劳动分工，为不稳定的劳工、妇女和未申请的移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发展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其需要从一个未发展／非资本主义的「外部」地区／社会来获取原料和中间产品，并需要将自身的社会与生态负担转移至此地区，借此来调节有偿劳动和无薪

的照护工作。发展资本主义具有排他性，且是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为运作前提。借着在无数组织性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此种秩序得以被规范化，使得那些由此受益的人们得以忽视其带来的暴力。

> 霸权

为社会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却又受到推崇的石化工业者，显示出帝国的这套生产与生活模式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此即与Antonio Gramsci 所描述的霸权不谋而合。这套模式被铭刻在具宰制地位的论述（如「增长的需求」）与主观意识（如「获取更多」、「降低价格」）之中，且越来越受到数位化的趋势助长；并为全球北方的许多人，以及少数全球南方的人们带来了物质与财富、创造了利润与工作。在其他地区，对劳动和自然的剥削，则是资本家与劳工在社会中妥协所带来的现象；其同样发生在全球北方的阶级、父权、种族化社会中，社会与地域不平等的现象极度严重，甚至在近几十年间不停加剧。

>>

在全球北方，食物、交通、电力、暖气或电信等，各个领域的日常所需，皆在很大程度上倚赖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物质流通、开采不同资源的工人、以及基础设施运作下，由全球吸收的生态汇。全球北方的工人同样依附于这样的体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构成美好生活的要素，并且仰赖其提供生活所需。事实上，这些全球北方工人购买 Philip McMichael 说的便宜的「无中生有的食物」(food from nowhere)、开车或是使用燃烧石油所产生的电力照明，并不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们必须这么做，只是为了养活家庭、上班，或是因为在许多国家的再生能源要价更高，而使得公司无法负担再生能源的使用。由此可见，帝国生活形式于全球北方的维生体系中物质化、制度化，使得这些工人们被迫成为此种生活形式的实行者。

> 北方—南方关系

帝国的生活形式，意味着一种全球规模的阶层制度：自殖民主义出现以来，全球南方经济体中，以原料采集、工业生产为主要形式的劳动与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符合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需求。家庭阶级、性别关系、种族关系并非独立于这些需求之外，其在本质上即是以这些需求为导向。

提出帝国生活形式此一概念的目的，即是要将新殖民主义之下的南方—北方关系呈现出来并作出解释——统治、权力与暴力，如何于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层面，在消费与生产实践之中被正当化，最终被认为是可被接受的？许多女性，尤其是被种族化的女性，在劳动分工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其劳动与身体皆受到更大程度的剥削，贫穷出现了女性化的趋势。这套生活方式在地理上扩展至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并深植于社会当中。

当前的全球整体以及其历史构成，同时具有生产性与破坏性特征；其是由不均衡的发展与相互依赖、危机倾向与帝国生活形式维持稳定的因素等面向所形成，然而这些逐渐加深的危机，却有部分同时也是解决危机的要素。

如此矛盾的动态，可以由人们尝试以电力取代汽车引擎的案例来说明。倡议此方案的经济、政治与科学人士宣称，由于交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这样的作法将成为气候危机的有力

解方。然而，电动车实际上对于克服环境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原料取用只是从化石燃料转变为金属原料，电动车仍然会在全球南方的矿产地区中，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由汽车凌驾于脚踏车、行人、公共运输工具之上的交通情况依然存在。

由电动车为主打的「绿色经济」，宣称其能带来更高的投资利润与就业机会，并缓解生态危机。与此同时，其仍然停留在服膺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形式的基础之上，无助于在生态现代化的走廊上更进一步。绿色资本主义的形成，将导致如欧洲绿色协议这类的绿色经济策略出现，其可能有助于处理近年来日益明显的社会、生态矛盾。然而，这套策略的实行，是以空间外部性和时间有限性为前提，在此情况下，社会与环境成本将持续产生，并在空间和时间上外部化。

> 待讨论的启发性思想

「帝国生活模式」带来的启发性思想，同时借鉴了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丰富知识传统。值得在此提及的，是拉丁美洲的批判性思考对于不同领域的贡献，例如对于依赖理论与政治生态学的讨论，以及「结构异质性」(caudillismo)、秘鲁社会学家 Aníbal Quijano 提出的「权力殖民」(coloniality of power)、由 Edgardo Lander 提出的「知识殖民」(coloniality of knowledge)等概念。

继续这些方法之间的对话，并进一步应用于实证研究，将帮助我们理解帝国生活形式，以及其日益增长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我们注意到危机发生时，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案；并认知到那些被预设的常态，并不是那么正常。借此，我们将能更深入地探究，团结的生活形式具有何种潜力以及轮廓。■

來信寄至：

Ulrich Brand <ulrich.brand@univie.ac.at>

Markus Wissen <markus.wissen@hwr-berlin.de>

1. Brand, U. and Wissen M. (2021)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Everyday Life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倫敦: Verso.

> 抛弃人类世：资本世中的人类与自然

Jason W. Moore, Binghamton University, 纽约, 美国



来自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的街头艺术版「大鱼吃小鱼」。
来源: Cecily Bang。



人类世是新千禧年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环境主义概念之一。但这样的概念是否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人类世？「人类」的世代？这样的词汇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而且很科学。气候危机的严峻现实被认知为一场重大的冲击、一个关于堕落的故事——人类「战胜了强大的大自然」。对于地球系统科学家来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绝对是无关政治的；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这些致力于寻找「金钉子」(golden spikes)——寻找地质人类世的学者于是开始编造一套关于人类的故事。他们以科技与人口统计，取代了围绕着现代性历史的争议论述——「人口人类世」(Popular Anthropocene)就此诞生。支撑这个概念的两个要素，是瓦特蒸汽机(1784)以及「人类的快速扩张」。如果说历史本身是糟糕的，那么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又更糟了一点。因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与此无关，帝国资产阶级霸权的制度就是借其运转。Thomas Malthus 的反革命小册子(1798)是在前所未有的社会激进主义中出现的；Paul R. Ehrlich 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 1968)问世时，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抗争正威胁着战后的资本主义。与如今的

人类世相同，在这两个时期，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分裂，在自然主义的洗礼台上被消弭殆尽。这件事传达的讯息是：不要注意事情背后的操偶人。我们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就是「自然法则」能够自行做出有效的管理。

> 人与自然，从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到「别无选择」

如果你曾经觉得世界末日比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想象，这就是原因所在。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将那些试图追求公理与民主的抗争从历史上抹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人类世只是一种绝望的生态学。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环境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诠释，人们只能接受行星管理的必然性(就连这点听起来也不太实际)。人类与自然的观念对于我们如何想像环境而言，是一种完美的鸦片，这个概念只会和我们说：「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却从来不曾试图定义、甚至打破背后的系统。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样的观念促使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和管理阶层，诚心地向人们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懊悔与焦急，然而这样的告解在政治上却毫无用处。与此同时，那1%的人们则将我们推向行星的地狱。

>>

可以说,「人」与「自然」并不与此无关。这两个词汇(以及它们的同源词,如社会)直到1550年资本主义历史的转折点之后,才有在现代英语中有了意义。那是个气候危机、极度无产阶级化和种植业革命的时代。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人与自然形成了一组支配性的抽象概念:为了服务无止尽的积累,而重新组织人类和其他生命之网的一套实用指南。在文明化的推进中,这些抽象概念构成了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人类是在自然之上的。这种意识形态使现代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得以可能,这一切都被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以及人们基于过去的历史而发展出的获利动机扣连起来。这便是资本世(Capitalocene)的开端——一个结合了统治、开发和环境形塑等策略的地质年代。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权力、利润和生命的世界生态系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影响范围。资本世将阶级剥削和盈余积累,在生命之网中编织出新的形式。1492年,资本主义盘古大陆被创造出来,成为了地球史上的一个生物地理分水岭。1610年的世界指标(Orbis Spike)——在Maslin和Lewis看来,标志出了人类世的地质起源——则成为碳减少的金钉子,是种族灭绝的直接结果,种族灭绝本身也是由奴隶制度和其他浅薄的、对自然的认知与策略而驱动的。

> 普罗米修斯主义:历史资本主义地理文化逻辑

这些策略并不是将资本积累概念去实体化的逻辑,而是借由一种新颖的地理文化统治模式——普罗米修斯主义所实现。在这套概念里,与人类这个物种无关的「人」站在自然面前,就如同上帝站在人的面前。对16世纪的西班牙人来说,善良的基督徒通过努力工作,可以拯救部落民族在本质上的不完美。作为帝国活跃于各地的原则,普罗米修斯主义使得帝国的牧师、士兵、商人和种植园的拥有者,迅速地「发现」了殖民地人民的野蛮、非理性,因此不够符合文明。只要将这些民族——原住民、非洲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无数其他民族——一一归化,他们就能变得更文明。帝国成为了「学习文明的学校」;于是之后每个帝国都为野蛮人带来文明,以及后续的「发展」。

这和气候危机,还有人类世又有什么关系?全部都有关系。大自然成了资产阶级不愿付出代

价保护的事物。将自然视作廉价的存在,是一种统治、资本累积的策略,其和赋予物品价值的「经济」时刻,一同被作为贬抑地理文化价值的、前所未有的的一套制度——这即是资本世的核心概念。

接下来,我们可以先回过头来对IPCC近日的声明,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人类造成大气层、海洋与陆地的暖化是无庸质疑的。」这样的叙述当然是事实,不过仍然太过片面了,因为「人类造成了这件事」,其实是最服膺于意识形态的论调。我们有正当理由质疑此种气候变迁的责任分配是否平等,因为这样的责任分配方式,是处在一个意图达成极度不平等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体系之中。

将气候变化视作人为(Anthropogenic)的影响,似乎成为了一种指责剥削、暴力、贫穷受害者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其他更精确、更好的说法吗?我会说,我们身在一个「资本造成的」(capitalogenic)气候危机的时代;意即,所谓的地质人类世,是由资本,而不是人类所造成的。1854年至今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三分之二是由90家公司所排放的。如今,最富有的1%人口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则是最贫穷的50%人口的两倍。

> 资本造成的气候变迁:走向资本世的安乐死

要理解现今的气候政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1492年以来,在普罗米修斯主义旗帜下展开的阶级政治。资本世的观点使我们认知到,支配、积累和环境形塑的模式,是21世纪气候危机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其将地缘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文化对生命网路的支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揭示了「资本造成」的三位一体:气候阶级分化、气候种族隔离、气候父权体制。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政治的挑战——即是要将世界历史之下,生命,统治与积累的网路纳入讨论。相对于绿色巨人的行星管理主义,我们也许能开始尝试,勾勒出一种工人阶级的政治;不再将生命之网视作由特定人掌控的事物,而是将其视为在世界各地争取解放与公义行动的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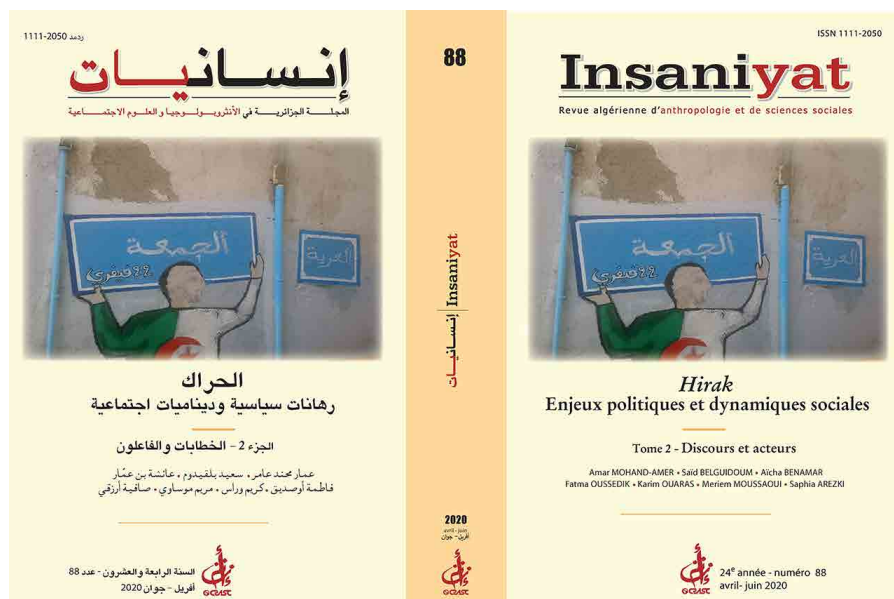
来信寄至:

Jason W. Moore <jwmoore@binghamton.edu>

> 马格里布社会学： 历史与展望

Mounir Saidani, University of Tunis El Manar, 突尼西亚,《全球对话》阿拉伯世界区域编辑, ISA 执行委员会成员 (2018-22)

Insaniyat (人文), 阿尔及利亚的文化和社
会人类学研究中心 (CRASC) 期刊。



《全球对话》为马格里布地区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传达他们研究生产过程和想法的机会,这是让原本不被重视的声音被听见的绝佳机会。坦白说到目前为止,「本土」社会学家以及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鲜少去争取曝光。即使英语系世界和法语系世界的情况不同,情况也是如此。过去十年我一直密切关注的《全球对话》是马格里布社会学家应该利用的难得机会。当《全球对话》编辑提议让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的社会学家发表意见时,其阿拉伯语世界编辑团队决定邀请整个地区(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西亚)的社会学家参与。不幸的是,我们只接收到三篇投稿。

第一篇文章简要介绍了利比亚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利比亚社会学家 Mohammad Eltobuli 回顾其社会学学科历史,可以追溯到利比亚大学的创立和第一个社会学系的成立,并对该学科在该国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趣的见解。在第二篇文章中,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Hassan Remaoun 让我们重温1960年代初期以来阿尔及利亚社会学的后殖民转向,并详细介绍阿尔及利亚大学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在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文中,我探讨了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在面临三重危机挑战时的表现。这种分析融合社会学史和社会学,目的是发起突尼西亚社会学家间,关于区域和全球领域的讨论。

这三篇文章指出了马格里布社会学的成就和不足。马格里布社会学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而在文章中有揭示出其中一些面向,并提出了几个科学问题:典范身份(paradigmatic identity)/知识生产的身份;地方/区域科学社群的结构化;其在国际社会学派和潮流中的位置等等。因此,这几组短文的目的是在于引起国内、区域中和国际性的对话和反馈。■

来信寄至:

Mounir Saidani

<mounir.saidani@issht.utm.tn>

> 利比亚的社会学

Mohammad Eltobuli, University of Benghazi, 前班加西大学校长, 利比亚



利比亚最古老的大学——的黎波里大学的校徽。

1955 年利比亚大学在班加西市成立时, 社会学成为了利比亚的重要学科。艺术与教育学院设有五个主修: 阿拉伯语、历史、地理、哲学和社会学。学院开始时有 33 名男学生, 其中 13 名是社会学学生。1959-1960 学年, 九名第一批的学生毕业。社会学系随后改为哲学和社会系。1972-73 年间, 两个系各自独立成不同系。1966-67 年间, 的黎波里成立了教育学院, 并于 1971-72 年在那里开设了社会学系。

> 进一步发展

1959 年发现石油后, 利比亚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变化, 利比亚政府开始更加重视普通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许多研究生被派往海外, 特别是到美国和西欧攻读研究学位。

由于利比亚在发展高等教育中, 需要更多的教职员在新成立的大学和社会学系任教, 印此派送了更多的研究生到国外。一旦他们毕业, 就开始回国进行教学工作和协助当时各校社会学系的外籍教师。到了 2002-03 年, 利比亚社会学系有超过 27 名教职员工。这些系开设了各种社会学课程, 包括社会理论、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和数据分析, 并将其作为核心课程。此外, 也有其他课程包括: 社会变迁、现代化、人口学、工业社会学、社会议题等。

这里聚集了数千名从全国各系毕业的学生, 如此庞大的毕业生数量和越来越多的合格教职员工导致了国内对研究生学习的关注。这也是由于利比亚与西方国家, 主要是美国之间正在发生的外部冲突。利比亚的研究生课程主要开设在两所主要的大学内: 班加西大学和黎波里大学。目前, 大多数科系至少会提供社会学硕士学位。利比亚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 1988 年在的黎波里成立的利比亚研究院。它在班加西、米苏拉塔、德尔纳和艾季达比耶都设有分校。该学

院提供不同领域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如科学、工程、法律、语言 and 文学以及社会科学。

大多数研究生在社会系主要关注利比亚社会问题, 例如现代化和发展。现在, 注意力转向与全球化、(后)现代化、贫困、国际冲突、流行病等相关的问题。

> 诸多挑战

这就是社会学如何在利比亚大学和利比亚研究院内扎根成长, 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的脉络。与此同时, 利比亚的社会学也面临许多困难, 其中包括大学部和研究生课程都缺乏固定的师资。这是因为, 大多数来自邻国的教师在进入其他学校, 尤其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之前, 都会在利比亚短暂地任教获取教学经验。另一方面, 在利比亚大学任教的教师大多是他们原本大学的知名学者。

其他遭遇的困难还包括图书馆不足和缺乏书籍和期刊, 以及缺少指导教授来指引学生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理论或

方法。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我将参考我的同事 Omran M. Al Gueeb 的访谈，他曾在全国会议上发表过一篇处理利比亚社会学的文章。除了以上的问题之外，他还提到了在研究生的学习上缺乏了确实而明了的策略。这样下来的后果是，学生跟指导教授选择的主题几乎与利比亚社会没有关系。

由于提高了大学部和研究生课程的品质，并在 1990 年代初在各大学和学院设立了品质管控办公室，让情况终于有所改善。课程中引入了社会学各个领域的紮实课程，并且在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社会统计和数据分析方面，都有称职的师资加入学系。这些努力带来

了回报，因为利比亚学生现在在国外攻读更高的学位是没有问题的。

> 结论

以上描述了利比亚的社会学，是如何随着五十年代中期利比亚大学的成立而紮根，并经过多年发展成为大多数利比亚大学中最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另一方面，其也面临着许多影响其发展的问题，包括课程浅薄，特别是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利比亚学者与其他地方的许多学者一样，未能发展自己的理论，也未能应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利比亚的社会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和其他大学的社会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社

会学在利比亚社会科学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坚实的领域。此外，许多社会学毕业生成为利比亚政府机构的领导者，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事务部门和教育部等担任非常高的职位。■

來信寄至：

Mohammad Eltobuli

<Mohammad.Tobuli@uob.edu.ly>

>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 教学、运作与地位

Hassan Remaoun, University of Oran 2, 已退休教授, 阿尔及利亚奥兰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CRASC) 研究副主任



2019-2020年发生于阿尔及利亚的「Hirak」(阿拉伯语)社会运动。
来源: 创用CC。

如何简洁地讨论当今阿尔及利亚社会学等学科的运作和地位问题? 简而言之, 我认为至少要考虑到三个方面:

- (1) 社会学教学及其引入阿尔及利亚大学以来的演变。
- (2) 学科的社会需求和机会。
- (3) 其在知识领域的地位, 以及相对于其他社会学科的整体动态。

> 社会学的教学

直到 1962 年, 阿尔及利亚大学才将社会学的教学和使用引入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主要是透过法国学界的中介, 在独立之后才遵循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这门学科刚开始依附在其他学科上, 例如: 哲学, 并在之后才建立道德和社会学的证照系统。社会学和研究博士学位可追溯回1958年, 同年文学学院改制为文学与人文学

院。1962 年 7 月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继承了这种模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阿尔及尔大学取得四项高等教育证书(CES)教授的社会学学位: 一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和社会经济, 以及可选修的北非民族志或人口统计。

从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开始, CES 被拆成几个主题性的教学领域, 整合了理论与实践或指导工作以及教程, 同时第一年的实地实习也包含在内。教学为期四年, 两年的核心教学再加上两年的专业化课程, 最后再撰写论文。与此同时, 自 1958 年以来一直仅限于阿尔及尔及其附属 Oran 和 Constantine 的大学数量, 如今已增加到了几十个。根据他们的策略, 这样可以开设一个或更多种不同的社会学专长(工作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政治

社会学等)。该教学最初采用两种不同的教学语言(阿拉伯语和法语), 接着在 1980 年代初完全阿拉伯语化。而哲学和历史则早在 1970 年代就已阿拉伯语化。这边还应该提到的是, 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即在欧洲通用的 LMD 系统), 大约在十年前就被采用。最后, 我想指出, 除了涂尔干和韦伯的传统之外, 几代阿尔及利亚社会学家在他们的理论方法上受到了 Ibn Khaldun 和马克思的影响, 也受到了 Pierre Bourdieu 和 Jacques Berque 的影响(特别是影响到阿尔及利亚和马格里布)。

> 学科的社会需求和机会

随着大学体制在国内的不断扩张, 以及在人口激增之下对教育系统产生的强烈影响,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社会学家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并非所有

人都从事与社会学直接相关的工作。他们根据工作市场的需求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职业中，主要是在公部门（行政、教学、新闻、警察、经济部门等），但也有在私部门的人。事实上，学习社会学的学生通常只是因为招生系统依照他们的分数将他们定位到社会学系，尤其是当他们的分数接近获得人文学科所需的最低平均时。

然而，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都需要社会学家。公共机构尤其需要统计调查方面的专业知识，例如人口普查（可追溯到1850年），而这些调查需要在特定地点进行评估和规划。这里举几个例子：社会福利、社会运动的预测和控制等，更是需要社会学专业知识的其他议题。公部门主要偏好实证调查，而社会学家在大学教学和研究的方​​式也受到肯定，后者正是透过大学论文、大学实验室和国家研究中心进行。因此，1998-2002年关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方向，和五年计划列出了30个国家研究计划，其中10个直接或间接涉及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的「人口与社会」计划列出了118个主题，分成32个主轴和7个研究领域：（1）城市和空间（2）农村空间（3）家庭、妇女和社会（4）人口迁移和空间分布（5）工作就业（6）社会流动（7）知识、表达和想像。

> 地位和角色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出现的民族国家，继承了殖民遗留下来的大学和科学体系。然而，其受到了批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更是如此，其认为这是使殖民秩序永久化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这种情况在历史学、民族志，甚至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学科的种族主义预设之下显得更加真实，在殖民精英接受培训的大学中运作的「阿尔及尔学院」更是如此。因此，这个年轻的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目标重新构建知识领域，首要目标是恢复长期以来被侵犯的国族认同，以及重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因此，人类和社会的科学或是运用他们的研究者，必须在两个典范的框架内重构自己：

第一个，出于身份认同，以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历史）为主，包括哲学、神学（伊斯兰科学）、Fiqh（伊斯兰法学）、阿拉伯语研究，以及与人格和教育相关的心理学。

第二种由发展主义支持，由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现代化的学科构成，包括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临床或工作心理学家。

在这种总体脉络下，社会学与所有其他被提到的学科一样，在其自身的认识论和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之间陷入困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协商和规避是永远的诱因和作法。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几十年前相对边缘化的人类学现在正在大学课程中重新被重视和建立，有时还会与社会学融合，被置于社会人类学的框架内。■

來信寄至：

Hassan Remaoun

<hassan.remaoun@gmail.com>

> 突尼西亚社会学： 面临三重危机

Mounir Saidani · University of Tunis El Manar, 突尼西亚·《全球对话》阿拉伯地区编辑, ISA 执行委员会成员 (2018-22)

CERES是突尼西亚第一个社会研究中心, 成立于1962年。
自1964年以来, 持续出版突尼西亚社会科学期刊至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突尼西亚本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不断变好的社会。然而, 在 2010 年至 2011 年突尼西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 分析家就不那么乐观地书写失败和危机的故事。去年, 健康危机已成为社会危机, 使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贫困。突尼西亚面临的危机同时有三个层面: 经济、政治和卫生。

我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 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如何应对这场震撼突尼西亚的三重危机?

我首先将呈现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大致情况, 再评估目前盛行的研究典范, 最后评价参与公共讨论的社会学家。总结的部分, 我会尝试呈现度过危机往前进的方式。

> 组织薄弱的科学社群

2021年举行的国际法语社会协会 (AISLF) 第 21 届大会是在突尼西亚举行的第二届大会。然而, 尽管突尼西亚参与该协会已经一段时间, 但并没有成功抓住为突尼西亚社会学增加受众的机会。突尼西亚参加 ISA 科学会议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 但只有少数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在随后的会议中注册。在突尼西亚成立的阿拉伯社会学协会 (1985) 的衰弱, 是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公共参与低落的另一个例子。但是, 他们确实参与了阿拉伯社会科学理事会 (ACSS) 几乎所有活动, 以及全球阿拉伯复兴研究所 (ARIG, 成立于 2019 年) 和阿拉伯社会研究国际网路 (成立于 2020 年)。一些更著名的突尼西亚社会学家也参加邻进国家的社会学活动——例如视讯会议、会议和讲座。

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参与国际活动时寻找网路连结、对话和认可。然而, 这些参与者都只是个体式的投入。这种独自投入的众多原因之一是突尼西亚社会学缺乏任何社会学界自主的组织社群。突尼西亚社会学协会 (成立于1988 年) 在过去四年中几乎没有举办过任何活动。其第三期Al Muqaddimah 期刊 (也是最后一期) 已经是 2010 年的事了。其三年一次的大会截止日期早就过了几个月。在新一代突尼西亚社会学家普遍感觉被老一辈排斥, 因此他们也排斥老一辈作为回击。如果不与突尼西亚阿拉伯与政策研究中心等在财政和组织上更强大的科学机构合作, 几乎不可能举办社会科学活动。

有这种结构薄弱的网路, 这样的社群很难应对每天变化

>>

的社会学环境。然而,我认为突尼西亚社会学家也表现出应对社会变化的无力。这种无力与迄今为止流行的研究典范有关。

> 一个拒绝社会变迁的典范

就像他邻近的北非国家,当代突尼西亚的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是建立在殖民遗产上。后殖民-但未必是去殖民-社会学继承一种从上而下由国家主导社会变迁的愿景。在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探讨发展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学是非常肤浅的。由于这样的浅薄,让公民社会在解构/再构民族国家的权力部属中占据微小的位置。威权政府本身是历史变迁的行动者。突尼西亚民族国家的概念被视为纯粹的幻想和发明,他无法控制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因此,当2010-2011年突尼西亚革命发生时,这样的革命不符合当时流行的社会变迁分析典范。

2010-2011年革命的历史转折清楚地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学言究典范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现有的研究典范使社会难以理解、概念化国家当前的情况。

同时,新冠肺炎危机进一步使理论典范的讨论更加复杂。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在该领域研究的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借用牟斯的概念,将COVID-19视为总体社会事实。这是对变化的观察的极具呈现张力的描绘。但只有少数社会研究在讨论客观性/主观性、内部/外

部、地方/全球和历史/结构等问题。要摆脱旧的流行观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来自底层的社会声音尚未迫使社会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分析立场。

朝向新典范的转移是一项大胆的举措,而且才刚刚开始。除非更广泛地传播社会知识,否则它不会成功。

> 不公共的社会学

突尼西亚社会学和科学界之所以难以面临上述的困难是因为社会学知识仍然是菁英主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显然在于长期的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突尼西亚大学与社会隔绝,社会学者被排除在社会讨论之外。事实证明,公共讨论的缺席问题是突尼西亚社会学家面临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

至于突尼西亚的社会知识的具体特点,值得强调的是语言议题至关重要。一方面,尽管突尼西亚的社会学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阿拉伯语化,但至少部分是用法语授课。老师向学生展示主要概念时,通常会附上法文相对照的概念。虽然英语使用上极少,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用法语进行的。另一方面,在准阿拉伯语化的情况下,社会学知识和发现仍然难以普及。因此,人们是可以主张说因为科学术语的使用缘故,社会学话语很难扩展。在挑战其他更根深蒂固的社会话语时尤其如此。在一个陷入不可阻挡的社会变革使得不同的社会论述彼此差异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的声音难以凸显。因此,突尼西亚社会学家很难在公共辩论和公共领域中作为理性专家,难具有正当性。

> 结论

本文展示了突尼西亚社会学在历史中如何受到挑战。这篇文章提供过去十年来社会学受挑战的见解。突尼西亚当前的三重危机是突尼西亚社会学的又一个转折点,但似乎没有很好地处理。

本文旨在激发对突尼西亚未来的深入讨论。引发这种讨论的一种方法是弥补不同世代突尼西亚社会学家之间的隔阂、个体生涯需求和集体行动。必须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层面同时增强他们的网路能力。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样一个具充分准备的突尼西亚社会学可以为国际社会知识的进步做出宝贵的贡献。■

來信寄至:

Mounir Saidani

<mounir.saidani@issht.utm.tn>

> 从对疫情的回应 看不平等问题

Wilma S. Nchito, University of Zambia, 尚比亚



于卡桑巴学校以及另外58所学校，所设置的大型洗手站。

来源：卢萨卡水安全倡议组织 (LuWSI)。

当 2020 年 4 月初尚比亚宣布首例肺炎病例时，从社交媒体上的一连串评论就能看得出来，许多人都认为这种疾病只会部分影响社会而已。由于那位个例刚从欧洲度假回来，也因此助长了一种看法，认为越富裕的人越容易感染这种新疾病，而一般平民则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随着第一波疫情的进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受到最大影响的确实是富裕的社区。而这使得公共健康资讯难以传递到计划外的居住区和农村地区，因为他们通常会问：「你有见过死于 COVID-19 的人吗？」在没有切确证据的情况下，疫情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骗局。有些人会抗议说，这只是政府为了获得捐款的方式罢了。

> 第二波疫情

第二波疫情与第一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阴谋论却是越演越大。长久以来，低收入社区的居民都很少注意到公共健康的警告，大家都认为没必要戴口罩。在城市的某些区域，戴口罩反而

会被认为是在传播病毒。这显然地是一个有关两个城市的故事，一边有戴口罩，另一边没有。虽然国家层面当时有应对 Covid 并对其采取行动，但毕竟很难知道住在计划外居住区里的基层人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有哪些措施为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在随后的数波疫情做好准备？这就是路沙卡水安全倡议 (LuWSI) 派上用场的时候。LuWSI 是一个涉及公共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社区组织 (CBO)、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多重利害相关人之协作系统。LuWSI 要达成的目标是：「人人享有用水安全，并维持一个健康繁荣的城市」。该倡议于 2016 年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自然资源管理计划 (NatuRes) 的支持下启动，现已发展成拥有 30 个合作夥伴的组织。虽然这些合作夥伴都有自己的核心目标，但他们也一起共同努力改善城市的水安全。

> 基层民众对 Covid 的回应

当 Covid 病例在 2020 年年中开始在该国上升时，LuWSI 的合作夥伴就在思考该如何为

>>



为推广洗手而向学校捐赠的水箱。
来源：LuWSI。

改善低收入社区的卫生习惯尽一份心力，因为在 Covid 疫情之下需要增加平时的用水量和购买额外的肥皂和消毒剂。低收入社区已经竭尽所能地想办法度过每一天的生计，而 COVID-19 现在又为家庭支出上带来了另一项成本。因此，LuWSI 的合作夥伴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介入措施。尽管尚比亚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但他们仍是持续致力于设计出不同的方式帮助贫困社区。目前他们已经在路沙卡市内实施了数次介入措施。这包含一些最初步的协助方式，像是对市场清洁及消毒、提供洗手台和肥皂、设立「脚踏式」洗手站，以及提高对 Covid 的认识等活动。

尽管低收入社区的学童是病毒的潜在带原者，但他们却接收不到任何消息和得到介入措施的帮助。意识到这一点的路沙卡市议会，在绿色学校夥伴计划(Green Schools Partnership Programme)下发起了「安全返校运动」(SB2S)，扩大帮助到全市100多所学校。主要合作的夥伴是水援助组织(WaterAid)、路沙卡市议会、教育部和卫生部。SB2S 运动包括了对社区成员进行居家照护的培训、改善学校对 COVID-19 的态度以及促进卫生情况等。在这项运动中，学校配备了数个「脚踏式」洗手台，以防止学童在洗手时交叉感染。此外，学校还配备了大型水箱以缓解缺水问题。

LuWSI 进行介入的另一项方式是在分区下制定 COVID-19 的响应计划。区域发展委员会(WDCs)专精于沟通技巧方面的培训，这让他们能够在社区中去讲述有关 Covid 的故事。在经过 WDC 的培训之后，基层社区的民众将会得到个人防护设备(PPE)的材料，去执行 LuWSI 下另一项进行中的介入计划。在这项新倡议下，参与 COVID-19 响应计划的 WDC 将获得手套、清洁剂、消毒剂、肥皂、消毒用的氯、滚轮垃圾桶、扫把和水箱等物资。

> 成功的一小步

本文所提到的介入措施可能会显得有点局限且规模较小。要是有人问：LuWSI 协作平台如果没有干预这些低收入学校和社区会发生什么？答案也很可能是「什么也不会发生」。显然，中央政府已致力使用 Covid 下应遵循的指导方针去教育民众。政府还发布命令，要求学校和营业场所必须确保能提供足够的消毒或洗手的设施，但大多数学校及社区服务都难以负担得起这些疫情所带来的额外要求。在这种情况下，LuWSI 会整合平台上不同合作夥伴的资源，为低收入社区提供即时的帮助。这个协作平台已经表示，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成功协助中央政府对抗病毒。■

来信寄至：

Wilma S. Nchito <wsnchito@yahoo.com>

> 以 Kuhn 的哲学理解 Ibn Khaldun 的典范

Mahmoud Dhaouadi, University of Tunis, 突尼西亚, ISA历史委员会(RC08)、宗教社会学委员会(RC22)、语言与社会委员会(RC25)



Ibn Khaldun 于突尼西亚的雕像。
来源: M. Dhifallah / 创用CC。

本文聚焦于 Ibn Khaldun 在著名著作《神学绪论(The Muqaddimah)》中的发现, 他所发明的新科学, 阿拉伯语为「Ilmu al umran al bashari」, 即「人类文明和社会组织的科学」。我将使用现代哲学的科学视角, 和 Kuhn 的概念如典范、常态科学和革命科学, 来说明导致 Ibn Khaldun (1332-1406) 发现「新社会科学典范」的过程。

熟悉现代哲学科学文献, 与捕捉《神学绪论》作者的革命科学精神习习相关。我概述了 Kuhn 的概念, 以了解他所谓从常态科学到革命科学的转变, 并评估 Ibn Khaldun 的社会想法。

> 典范的概念

在日常对话中, 「典范」一词用来表示被复制或遵循的常见案例或模型。一般来说, 正如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所言, 相关科学界对要遵循的理论和方法论规则、所使用的工具、要研究的问题, 以及检视研究的标准, 有一个共识。这种共识源自科学界采用一些过去的科学成就作为其「模型」或「典范」。以下会继续论述, 这种「典范」的概念彻底改变了对科学哲学的思考。

> 常态和革命科学

在他的书中, Kuhn 提到两种科学: 「常态科学」和「革命科学」。Kuhn 认为常态科学是科学家在其领域内共享的知识、概念、理论和规则。偏离这一点将使它们被该科学领域驱逐。因此, 常态科学是建立在科学界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假设。常态科学将过去的科学成就, 视为其下一步实践的正当性基础。为此, 常态科学经常压抑基础的革新, 因为这必然会颠覆它的基本保证。因此 Kuhn 解释, 常态科学可以透过科学成就的「累积过程」来取得进度和进步。

然而 Kuhn 指出, 科学革命是一个「非累积」的发展过程, 旧的典范被无法兼容的新典范全部或部分地取代。Kuhn 认为, 导致「典范转移」的科学革命类似政治革命。后者起于社群成

>>

员渐渐意识到，现有机构已不再充分解决他们创造的环境所带来的问题：「异常」和「危机」。从危机中的典范过渡到新典范，同时产生新的常态科学传统，并非一个累积的过程。

> 阿拉伯穆斯林的史学危机

Kuhn 的观点可以应用在 Ibn Khaldun 的科学道路上。Khaldun 科学道路的第一步体现在他对穆斯林历史学家的「强烈批判立场」。他明确表达穆斯林历史学正处于「全面危机」中。他的话，如下所示，非常响亮地表达了他对于那些历史学家缺乏科学可信度的观感。历史学科，或 Ibn Khaldun 所说的「历史艺术」，在他那个年代和之前的穆斯林世界似乎并非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用 Kuhn 的概念理解的话，穆斯林历史学正处于危机之中，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亦即「革命性典范」，从过去穆斯林史学家所累积的知识传统中分离出来。《神学绪论》的作者批评了不同时期的穆斯林历史学家。这段引述描述了 Ibn Khaldun 对穆斯林历史学状况的看法：

杰出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收集，并以书籍的形式写了下来。然而，随后，那些无权参与历史的人，将他们自己想出来或随意编造的不实八卦引入这些书中，以及他们编造或修饰过后的虚假、不可信描述。他们的许多后继者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将听到的资讯传递给我们。『他们没有寻找』也不在意历史事件和状况的成因，也没有排除或拒绝无意义的故事。『几乎没有任何努力被放在了解真相上面。』[...]对传统的『盲目信任』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特性。』¹

> Ibn Khaldun 革命性的新科学

Ibn Khaldun 发现的新科学与 Kuhn 的革命科学典范相符。Ibn Khaldun 强调他的科学「并非累积过程的结果」。因此，以 Kuhn 标准来说，它确实是革命科学。《神学绪论》的作者承认「没有人」写过和他的新科学相关的题材：「事实上，我没有遇过任何人沿着这些脉络进行讨论。」Ibn Khaldun 提到许多思想家和书籍，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Mobethan》²，以及穆斯林思想家的书籍。他肯定自己的新科学并非受到这些书中思想的启发：「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意识到了这些事情，没有亚里斯多德或《Mobethan》的教导。」Ibn Khaldun 进一步描述了新科学的一些特点：「[新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这门科学]有自己独特的主题——人类文明和社会组织。这个题目的讨论是新的、杰出的、有用的。」然而，Ibn Khaldun 对他崭新创新社会科学的范围仍然保持谦虚：「如果[...]我略过了某些重点，或者如果[这门科学]的问题与其他问题搞混了，那么纠正的任务依然会落在挑剔的批评家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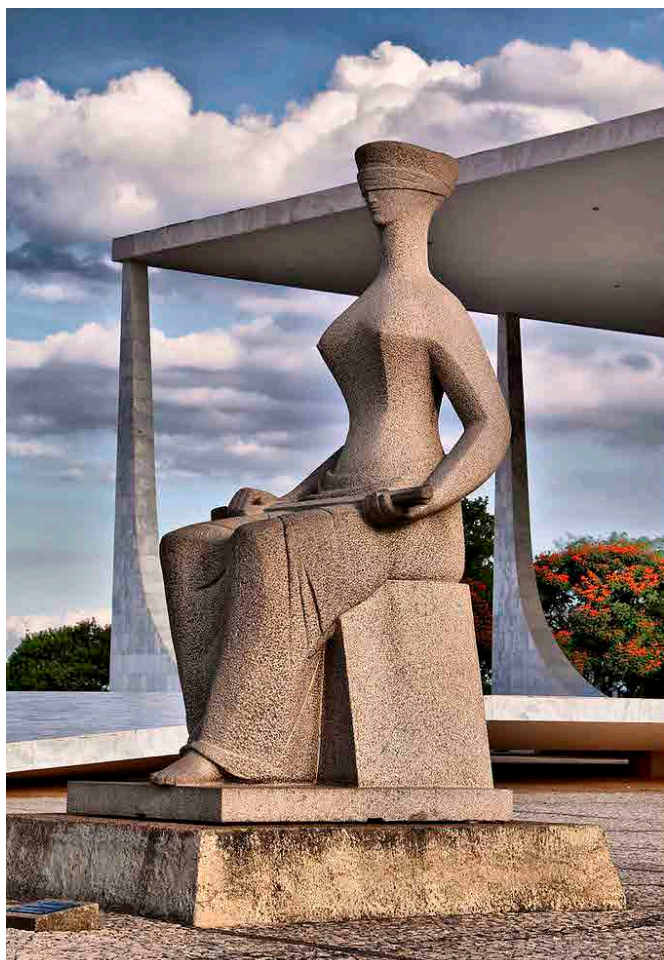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Mahmoud Dhaouadi <m.thawad43@gmail.com>

1. Khaldun I. (1980英文版, F. Rosenthal 译)《神学绪论》，vol. I:6-7。
2. Mobethan 是一本类似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的印度书籍。

> 社会想像与巴西的法律社会学

Francisco Bedê,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 巴西, 以及 Gabriel S. Cerqueira, 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 巴西



Alfredo Ceschiatti 创作的《A Justiça》。这座雕像位于巴西最高联邦法院大楼前方。

来源: Ricardo / 创用CC。

想像(imaginary)的概念在对当代巴西的法律运作情况的理解中愈发占据核心的地位。它是一个关键概念,用以分析巴西法律下的社会系统以及社会动态和国家政治(作为法律社会学的对象)的其它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现代生活之核心的价值与愿望的具体化。上述现代生活包括:1)一种从属于公民透过其代表而不是寡头政治的规则的积极参与的民主政治生活;2)一种经济上自主且有效率的国家发展;3)一种奠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国家的有效运作仅发生在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度以内。

想像,在此应该理解为一种在主体的诸表象(representations)与诸实践中形成的世界观,也就是在能够当作集体动态和制度运作的共同参照而加以动用的范围内被Cornelius Castoriadis 称为「社会想像」的那种东西。在这个意义下,想像的概念与意识形态的概念类似,只要人们不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虚假意识」,即对现实的错误表象,而更多地理解为那种为人们的具体行动提供意义坐标(coordinates of meaning)的东西。此外,我们将借想像的概念勾起对如下事实的注意:世界观往往是与那些不立即合乎逻辑的方面(如那些不能被仅仅化约为理性的方面)有着深刻连结的。这就是说,社会想像很大程度上在字里行间(in between the lines;译按:在中文的语脉里或要理解为言外之意、旋外之音,表示在表象的背后有着另外的意涵)运作,唤起隐含的情感和意义。

> 现代法的抽象性

现代法的抽象性乃是法律社会学之所以应该连同考虑想像的概念的主要原因。现代法是根植于公民制度中的,后者将其中所有个体定义为既平等又自由的自主性主体及基本权利的承担者。它预先假定了一个高度抽象的权利主体:一个公民是以他/她是自由的并与其他公民一样拥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之事实而被定义的。由此,那些超出抽象平等之范围的现实及个人具体生活的诸方面便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一部分因而不属于权利的对象而被法律加以抛弃了。从而,要成为现代法和现代合法性秩序(modern legal order)的一部分,就必须在此一抽象形式上被定义(所以即便是特定权利和所谓的「少数权利」都必须当作公民基本自由和平等的表达加以阐述)。

尽管此一抽象且「普遍」的法律框架的规范性基础否决了任何专断的和特殊的强制实施(此

>>

有鑑于现代法并非其法学家及律师们的意志及诠释的表达)，同一个法律框却强迫其操作者将抽象的编码(abstract codes)转化为关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决策。因此，决定性的方面不在于法律系统从属于政治或特定行动者的利益(虽然这常常发生)，而在于从抽象法则到具体决策的过渡中，想像透过给出抽象法所不能提供的坐标而自身强加(imposes itself)。

> 将法律根植于社会想像

另一方面，在现代法的合法典范中所引介的(抽象的)公民观念乃是以非公民空间的生产为标志的。悖谬地，从绝对论者的主权权威到人民主权的转换中，在重新将绝对论者的主权之政治内容重新分配给「公民」的同时却留下了社会团体中缺乏政治权威的一个部分。倘若这一间距(gap)没有在肯定性的法律秩序中得到明确的巩固，那么它便将继续地存在于每一天的社会生活中。此一矛盾往往强加给了法律的操作者。

Walter Benjamin 是第一位注意到上述情况并尝试发展一种寻求法与想像之内在关联的诠释的人物(可从多种方面证明)。根据这种诠释，法律制度将会在其社会外部性(抽象法的地域)及法律设立的专断性中的无理性之暴力之间构成性地分裂。此一法律同时(且同步地)是一种对「合理的」内容的宣言而又是一种专断的「无理性」禁令。由于在法律制定的时刻，其叙事总已建立一个后验(a posteriori)，上述的分裂因素便就在 Pierre Legendre 称为「教条式秩序」(dogmatic order)的对法律的教条式诠释中逆动地(retroactively)隐藏了。

透过这种方式，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之门开通了，它细察一种内在化的社会想像，该想像围绕现代性的分裂的法律秩序提供了一种阐述(一种世界观)——我们可称之为想像的根植(anchoring)。根据此一进路，人们可以探索以国家历史形态为标志的主体形式，该形式(再)生产于法律训练的动态和法律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并在法律体系中建立起内部秩序。

巴西法律能够无限制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处理大众及统治阶级的(非)合法性并不是偶然的。想像的秩序要取代法律自身固有的矛盾、冲突和不连续的部分(在现代抽象法及其任意且暴力的超我[superegoic]基础之间)，后者在法律上维持着此一行为并赋予其以正当性。是什么授权予并正当化能把一个个体「因为他们的种族」而被关联到整个犯罪集团的那种司法决断？是什么正当化了——尽管只是在法律论述的言外之意中——那些在巴西棚户区中针对黑人及穷人的违法警察行动？或者每日出现在报章上的诡辩的决断论(decisionism)？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方法上的结合对于理解复杂且矛盾的巴西法律来说是必要的。这将不仅仅需要传统法律社会学的教训，而是同时需要结合哲学、精神分析及历史，缺少了其中一项将无法恰当地看清法律领域中关于想像的中心观念。■

來信寄至：

Francisco Bedê <franciscojuliaomb@gmail.com>

Gabriel S. Cerqueira <gabrielscerqueira@gmail.com>